

漢晉時期河西羌胡中的小月氏

陳健文*

摘要

月氏在西漢初期被匈奴擊敗後被迫西徙中亞，自此後西遷的月氏部眾被稱為大月氏，而留在河西走廊未西遷者則被稱作小月氏。傳統史料對小月氏的記載十分零散，因此小月氏在漢晉時期的蹤跡便顯得混沌不明。史家發現漢晉時期的月氏人多以「支」為姓，本文擬先追跡漢晉時期史籍中小月氏的活動歷史，接著試圖估算兩漢時期小月氏的族群數量，從人口比重的角度凸顯其在漢晉河西地區的族群地位，最後再從史料記載中探索小月氏人身上所展現的一些內亞習俗。本文發現小月氏在兩漢時期河西涼州地區仍至少保有三至五萬的人口，約占當地漢族人口的十分之一，是當地一支不可忽視的族群力量。且東漢末年在河西所謂的「羌胡」勢力中，小月氏可能是其中胡族的重要組成部分，董卓正是仰仗這支力量而在漢末崛起並操控政權。而從小月氏身上所展現的某些內亞習俗來看，小月氏人儘管已與當地漢族雜居超過二百年，但仍保留若干內亞游牧民族自身的胡人習俗（族群性），這可能也是小月氏人始終能維持其族群獨立的重要原因。因此透過追索小月氏在這段期間的活動，可以協助我們理解日後西晉五胡得以逐鹿中原的歷史背景。

關鍵詞：小月氏、義從胡、河西、羌胡、內亞習俗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撰寫過程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109-2410-H-003-097-），另蒙審查人給予諸多改進意見，謹申謝忱。

一、前言

月氏是活動於早期中國西北的一個游牧民族，對中國及中亞的歷史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然在匈奴冒頓單于崛起後，月氏連續遭到匈奴幾次重大的打擊，最後被迫西遷至中亞，但仍有部分的月氏人並未選擇西遷而留在河西一帶，這部分的月氏人被史料稱為「小月氏」，而有別於西遷至中亞所謂的「大月氏」。其實在月氏的歷史中曾出現過二種「小月氏」，其一是指月氏在遭匈奴擊潰後，「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¹的小月氏；²另一則是《魏書·西域傳》中所載的小月氏。³本文所討論者，為上述《史記》中所載留居中國西北的小月氏，而非貴霜王朝末期的寄多羅小月氏，⁴討論的時間斷限為戰國末期至五胡十六國時期。榎一雄曾經指出月氏的遷徙並不是一個族群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動，而是月氏帝國從其東部和北部邊境撤走，月氏從未向羌人尋求保護，實際上月氏只是同曾是他們從屬的羌人一起生活。⁵自先秦時期開始，在河西地區活動的部族就很複雜，民族的往來遷徙十分頻繁，下迄魏晉，於該區生活的部族依然呈現多樣

¹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卷123，〈大宛列傳〉，頁3162。

² 所謂的「南山羌」，任乃強認為是青海大通河上中游一帶的羌族，參見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頁71；但李并成主張此處的「南山羌」其實指的還是小月氏，是指南山地區（東起祁連山西至阿爾金山、崑崙山及柴達木盆地）歸屬於西羌的雜胡總稱。參見李并成、斯豪強，《敦煌通史·兩漢卷》（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頁36、155-157。

³ 其傳云：「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國號小月氏焉」。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02，〈西域傳〉，頁2277。

⁴ 有關寄多羅貴霜，參見萬翔，〈寄多羅人年代與族屬考〉，《歐亞學刊》，9（北京，2009.12），頁115-160；余太山，〈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歐亞學刊》，新2輯（北京，2015.10），頁14-34。

⁵ K. Enoki, G. A. Koshelenko and Z. Haidary,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700 B.C. to A.D. 250*, ed. János Harmatta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 176.

的狀態。本文旨在釐清小月氏在漢晉時期西北少數族群中的歷史地位，先追溯小月氏後裔的活動狀態，進而透過小月氏人口數量的研究，探尋小月氏在漢晉西北羌胡邊族中所占的族群比重，最後再從史料中有關小月氏人的行為描述中，一窺其所流露出的內亞游牧民族習俗。

以往學界曾熱衷討論有關月氏人的族屬問題，若月氏果真是與斯基泰-塞種（Scythian-Saka）有關的高加索種系印歐民族，⁶那麼對於理解早期中國西北地區的族群關係將具有相當的意義。榎一雄曾指出欲解決月氏人的語言歸屬問題，勢必非得透過一些小月氏人所遺留的固有名詞或官名的分析研究，才能獲得進一步的澄清，⁷但可惜學界至今對這個問題仍未有明確的共識。

早期有關小月氏的研究，霍古達（Gustav Haloun）的〈論月氏（Zur Üe-tsi-Frage）〉⁸是探討月氏河西時期歷史最著名的奠基之作，這篇於1937年所發表的論文中，對月氏名稱、故地等問題均有深論，特別是對小月氏人做出了詳盡的考證，今人研究小月氏問題仍需以霍氏的論文為起點。另外桑原鷺藏的〈張騫の遠

⁶ 月氏可能屬於操操伊朗語的斯基泰人部落，參見Berthold Laufer,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h-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R. R. Donnelley & Sons Company, 1917); Kazuo Enoki, "The Yüeh-c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Tokyo: Kyuko-Shoin, 1998), pp. 22-29。有關月氏為高加索種的論證，可參韓康信、潘其風，〈關於烏孫、月氏的種屬〉，收入西域史論叢編輯組編，《西域史論叢·第三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頁8-12；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63-64；陳健文，〈月氏的名稱、族屬以及漢代西陲的黑色人問題〉，收入國際簡牘學會編，《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一號）》（臺北：蘭臺出版社，1993），頁111-143；陳健文，〈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收入王元化編，《學術集林·卷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331-358。

⁷ 榎一雄，〈尉遲氏と小月氏〉，收入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記念會編，《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頁417。

⁸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2(1937), pp. 243-318，該文之中譯可看參看霍古達（Gustav H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歷史教育》，22（臺北，2019.12），頁153-225。

征〉⁹一文，亦對若干月氏史上重要的議題，諸如月氏之故地與西遷時間等也提出了相當重要的見解，是早期月氏研究中的指標性成果。在近人的重要研究中，日本著名中亞史學者榎一雄的〈小月氏と尉遲氏〉¹⁰以及〈漢魏時代の敦煌〉¹¹二文是二戰後日本學界對此議題最具影響力的論文，另外榮新江的〈小月氏考〉¹²與王宗維的〈盧水胡與小月氏〉¹³也是這方面較為重要的深度考證文章，又潮田富貴藏的〈湟中月氏胡について〉¹⁴亦是早期研究小月氏的專論。G. Benjamin 在其 2007 年的專著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一書中提出了一些新論點，譬如說按照游牧民族常見的部落分治傳統，小月氏可能是抗拒西遷的「第六翕侯」（按大月氏遷至中亞後曾分裂為五翕侯）統帥之部，而此部的組成分子極可能原先就包含了南山羌人，小月氏原本在族群上就是一支以羌人為主體的部落。¹⁵閔廷亮也指出任何一個在河西起主導統治地位的民族，諸如羌、月氏、匈奴等，並非都是單一的民族成分，其中還包含了其他民族的一些部落，烏孫、羌人諸部實際上都受到月氏的控制，成為月氏強大部族的一部分。¹⁶最近佐藤達郎在〈漢代における周辺民族と軍事——とくに属国都尉と異民族統御官を中心に〉一文中提出小月氏（義從胡）的軍事勢力，後來逐漸發展成東漢時期護羌校尉

⁹ 桑原鷲藏，〈張騫の遠征〉，收入宮崎市定編，《桑原鷲藏全集 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261-335；中譯本參看桑原鷲藏著，楊鍊譯，《張騫西征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

¹⁰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89-417。

¹¹ 榎一雄，〈漢魏時代の敦煌〉，收入榎一雄編，《講座敦煌 2・敦煌の歴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頁3-37。

¹² 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3（北京，1990.11），頁47-62。

¹³ 王宗維，〈盧水胡與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2（蘭州，1995.12），頁85-108。

¹⁴ 潮田富貴藏，〈湟中月氏胡について〉，《研究集録（人文・社科）》，8（大阪，1960.1），頁63-69。

¹⁵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Turnhout: Brepols, 2007), pp. 94-95.

¹⁶ 閔廷亮，〈小月氏考〉，《甘肅高師學報》，3：2（蘭州，1998.6），頁95。

的私屬兵力，最終竟被董卓所吸收而加入其下的涼州兵團。¹⁷

在史料研究方面，小月氏的歷史記載主要見於《史記》、《漢書》與《後漢書》。近年有一些關於小月氏的新出土文字史料陸續被發現，如最近剛開始公布的懸泉漢簡。另外在甘肅平涼的崇信縣，於1982年時出土了一個新莽時期背面有「月氏」銘文的貨泉銅母範，¹⁸由於漢代曾因安置月氏降人之故在該地設立過「月氏道」，此一考古發現無疑說明了當地在漢代確有月氏人生活於其間。近來利用簡牘新史料討論小月氏問題的有初世賓的〈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¹⁹與楊富學、劉源〈出土簡牘所見漢代敦煌民族及其活動〉²⁰二文。

以往有關小月氏問題的文獻討論，亦有部分集中在一些族源上疑似與小月氏有關的少數民族上，學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 廬水胡說：不少學者認為廬水胡即是小月氏，²¹但也有學者

¹⁷ 佐藤達郎，〈漢代における周辺民族と軍事——とくに属国都尉と異民族統御官を中心に〉，收入宮宅潔編，《多民族社会の軍事統治：出土史料が語る中国古代》（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8），頁215-242。

¹⁸ 周榮，〈甘肅崇信出土「貨泉」銅母範〉，《文物》，1989：5（北京，1989.5），頁55；楊濤、黃永會、孟志平、陶榮，〈「月氏」銘貨泉銅母範〉，《中國錢幣》，2016：4（北京，2016.8），頁40-41、彩頁9。

¹⁹ 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出土文獻研究》，6（上海，2004.12），頁167-189。

²⁰ 楊富學、劉源，〈出土簡牘所見漢代敦煌民族及其活動〉，《敦煌研究》，2019：3（蘭州，2019.6），頁32-44。

²¹ 周一良，〈北朝的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56；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403-41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91-396；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頁187；王青，〈也論廬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2（蘭州，1997.6），頁25-30；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頁80；劉淑芬，〈從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滅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臺北，2001.3），頁8-12；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頁174-175；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9、40、133-140；沈騫，〈河西小月氏、廬水胡與河東羯胡關係探源〉，《敦煌學輯刊》，2015：4（蘭州，2015.12），頁132-142；齊陳駿主編，《西北通史·第二卷》（蘭州：蘭州大學出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有認為盧水胡是源自於匈奴或義渠而非月氏，²²也有人認為盧水胡實為雜胡，²³榮新江亦認為在前秦建元三年（367）《鄧太尉祠碑》的碑文中，盧水胡曾與支胡並列，故盧水胡不可能為小月氏。²⁴

- (二) 羯胡說：學界有主張羯胡實為中亞月氏人，²⁵然也有異議者，認為在石勒手下有明為月氏人的支雄、支屈六，說明月氏不等於羯胡。²⁶
- (三) 休屠說：有人主張匈奴控制河西時期的休屠部，其實就是月氏人。²⁷
- (四) 渾邪說：認為霍去病所攻打的河西匈奴渾邪部就是小月氏。²⁸
- (五) 秦胡說：有以為出現於漢晉文獻上的「秦胡」，其實就是小月氏人。²⁹

版社，2005），頁220-221；陳琳國，《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106-107，不過陳琳國強調兩者其源雖一，但當時已分為兩部，不相混淆。

- ²² 黃烈，〈北涼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古代史論叢》，1982：1（福州，1982.12），頁231-235；黃烈，《中國古代民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08-312；趙永復，〈關於盧水胡的族源及遷移〉，《西北史地》，1986：4（蘭州，1986.12），頁50-53。
- ²³ 王宗維，〈漢代盧水胡的族名與居地問題〉，《西北史地》，1985：1（蘭州，1985.3），頁25-34；王宗維，〈秦漢之際河西地區的民族及其分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3（蘭州，1985.10），頁94-95；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05。
- ²⁴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0。
- ²⁵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8-31；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8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381-385。
- ²⁶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1。
- ²⁷ 錢伯泉，〈烏孫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遷的經過〉，《敦煌研究》，1994：4（蘭州，1994.12），頁104-107；錢伯泉，〈烏孫的種族及其遷徙〉，《西域研究》，1997：4（烏魯木齊，1997.12），頁28-39；武沐，〈渾邪休屠族源探蹟〉，《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1（蘭州，2004.1），頁10-15。
- ²⁸ 陳世良，〈渾邪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烏魯木齊，1989.5），頁44-46。
- ²⁹ 初昉師賓，〈再釋「秦胡」〉，收入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國際學術

(六) 仲雲說：有贊成五代中葉的仲雲即小月氏遺種者。³⁰

有關月氏後裔在中國活動的情形，可從其姓氏上略窺一二，蓋凡在中國境內以支為姓者，多為月氏的後代。³¹此議題在學位論文方面，有支靜〈小月氏歷史考述〉、³²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³³楊芳〈漢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統考述〉、³⁴馮霞〈論月氏入華的幾個重要問題〉³⁵與劉玉璟〈漢代入遷河西地區移民研究〉。³⁶其他零星研究尚有侯丕勛〈「祁連小月氏」族源新探〉、³⁷閻廷亮〈小月氏考〉³⁸與吳成明、吳方基〈東漢湟中月氏胡居住地考〉。³⁹

另在本文所擬涉及的小月氏人口問題中，陳良佐的〈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⁴⁰一文是目前僅見以此為專論的研究，雖

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7-27。

³⁰ 黃盛璋，〈敦煌文書中的「南山」與仲雲〉，《西北民族研究》，1989：1（蘭州，1989.7），頁4-12；蘇北海，〈大月氏的西遷及其活動〉，《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烏魯木齊，1989.5），頁32；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9。不過錢伯泉卻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仲雲為突厥之處月部，而非小月氏，參見錢伯源，〈仲雲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1（蘭州，1989.7），頁64-71。

³¹ 趙振績，〈月氏族系與亞洲氏地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16（臺北，1985.10），頁161-164。

³² 支靜，〈小月氏歷史考述〉（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³³ 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³⁴ 楊芳，〈漢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統考述〉（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³⁵ 馮霞，〈論月氏入華的幾個重要問題〉（蘭州：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³⁶ 劉玉璟，〈漢代入遷河西地區移民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2）。

³⁷ 侯丕勛，〈「祁連小月氏」族源新探〉，《青海民族研究》，2001：4（西寧，2001.12），頁28-32。

³⁸ 閻廷亮，〈小月氏考〉，頁92-95、109。

³⁹ 吳成明、吳方基，〈東漢湟中月氏胡居住地考〉，《邢臺學院學報》，33：3（邢臺，2018.9），頁131-132。

⁴⁰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大陸雜誌》，37：3（臺北，1968.8），頁8-32。

時隔五十餘年，仍深具參考價值。在小月氏人的內亞習俗上，楊希枚於〈論北海、僑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髡面之俗〉舉出《後漢書·鄧訓列傳》中記載小月氏人在聞鄧訓卒後，有以刀自割及刺殺牛馬之舉，此俗正與塞人同俗，⁴¹但可惜類似議題後來學界並未繼續深究，此為本文擬嘗試補足的部分。

總之傳統史料對小月氏的記載十分零散，僅在《後漢書·西羌傳》中有二百餘字稍有系統的記載，因此小月氏在漢晉時期的蹤跡變顯得混沌不明。本文希望透過對小月氏後裔的研究，凸顯小月氏人在漢晉西北羌胡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最後再從小月氏人的內亞習俗中彰顯其胡族性格，希望能釐清其在漢晉時期的歷史影響。

二、漢晉西北一帶的小月氏遺裔

據《史記》的記載，月氏在遭受匈奴襲擊後，被迫離開其原在敦煌、祁連間的故地，先移往西域的伊犁河流域，繼之再遷至中亞阿富汗一帶，而部分留在原住地的月氏人，⁴²則被稱為小月氏。⁴³對於小月氏為何不西遷而選擇留在故地？應非《後漢書·西羌傳》所言是因其「羸弱」之故，⁴⁴班傑明（G. Benjamin）就認為小月氏可能存在所謂「第六翕侯」之部，而此部的組成分子原本就包含了南山羌人而不同於其他以印歐人為主的月氏部落，這也是小月氏寧可選擇留在當地與南山的兄弟部族共居，而不願冒險西遷至未知中亞的緣故。⁴⁵有關月氏的故地是否在河西走廊的問

⁴¹ 楊希枚，〈論北海、僑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髡面之俗〉，《大陸雜誌》，38：1（臺北，1969.1），頁7-10。

⁴² 榎一雄認為這些所謂的小月氏人，其實是原來的月氏本部人。參見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1。

⁴³ 潮田富貴藏認為前漢時代漢史文獻中的小月氏，可能專指已經服屬漢朝的月氏人。參見潮田富貴藏，〈湟中月氏胡について〉，頁67。

⁴⁴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7，〈西羌傳〉，頁2899。

⁴⁵ Craig G. R. Benjamin,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94-95.

題，學界已爭訟超過百年，近來有多位學者提出月氏之故地其實在新疆東部。⁴⁶此說固可解決為何在至今的考古發掘中，尚未在甘肅境內發現高加索種人遺骸的問題，但卻無法解釋為何在兩漢時期，河西與鄰近的青海河湟地區還存在大批的小月氏人，故月氏在西元前二至三世紀之故地，還是應在東起蘭州、寧夏的黃河，西至敦煌河西走廊一帶的地域。⁴⁷自先秦時期以迄魏晉，河西地區民族往來遷徙十分複雜，個人較支持霍古達、榎一雄、榮新江與陳國燦等人的論點，即日後活躍於漢晉時期所謂「支」姓的胡族，主要應源自小月氏而非中亞的大月氏。⁴⁸

有關小月氏人在漢晉時期的活動，以西漢時期而言僅就《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所載，以小月氏人身分封侯者有兩人，另有一名為「月氏」者封親陽侯，身為匈奴降相，其族屬也應是小月氏人，⁴⁹故在漢武之世，作為降胡的小月氏人封侯者即有三人。其中封為驥茲侯的稽谷姑，是以小月氏若苴王⁵⁰的身分將眾來

⁴⁶ 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綜考〉，收入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編，《中亞學刊（3）》（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30-31；陳世良，〈渾邪考〉，頁38-40；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1（烏魯木齊，1997.3），頁11-13；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兼論西域三十六國之形成〉，《西域研究》，2013：2（烏魯木齊，2013.4），頁90-104；王建新、席琳，〈東天山地區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1（北京，2009.1），頁28-37；王建新，〈中國西北草原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收入黃留珠、魏泉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237-253。

⁴⁷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96；霍古達（Gustav M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頁204。

⁴⁸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73；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頁181-182；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409；榮新江，〈小月氏考〉，頁61注54；陳國燦，〈魏晉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與火祿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蘭州，1988.7），頁198-200。

⁴⁹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642。

⁵⁰ 浦立本將此「若苴」復原為中古漢語*nyāk-tsio 或稍早的*nyāk-tsia，認為該詞當出自吐火羅語 A *ñākc(i)*，吐火羅語 B *ñākc(i)ye*，其意為“gottlich, himmlisch”（神聖的，天上的），為吐火羅語 A *ñkāt*，及吐火羅語 B 的 *ñakte* 的派生詞，意為上帝（“god”），因此稽谷姑的王號若苴實為「聖王、天王」（“Divine King” or “God King”）之意。參見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降，另一封輒譟侯者名為杆者，也是以小月氏王的身分「將眾千騎降侯」。⁵¹漢朝非常重視這批小月氏人的歸降，不僅封此二小月氏王為侯，而且其受封戶數還超過同期受封的匈奴降王，並就近在張掖郡南部設立張掖屬國來安置小月氏降眾，因此高榮認為張掖屬國的民族構成主要應是小月氏而非匈奴。⁵²

小月氏在西漢匈、羌關係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因為漢朝如要切實做到「隔絕羌胡」，就需要爭取小月氏。⁵³蓋羌人原非匈奴臣屬，雙方並無直接之政治關係，故乃需以小月氏為中介。因匈奴統治張掖、酒泉一帶時，小月氏曾臣屬於匈奴，所以日後小月氏之所以稱為月支胡、支胡的原因即在此。⁵⁴故不論是匈奴聯絡諸羌還是諸羌聯絡匈奴，都是由小月氏傳遞訊息，小月氏因之成為匈奴溝通諸羌的中間橋樑，正應合了匈奴聯繫諸羌須經小月氏「傳告」記載。⁵⁵小月氏扼處從柴達木盆地到塔里木盆地東南端的出口，⁵⁶在漢朝控制河西走廊之後，匈奴與羌人之間的聯繫需從羅布泊繞進柴達木盆地西北端一帶，經小月氏之地而進入青藏高原。因此在河西、西域的南山地區，東起河湟、西抵葱嶺，

Royal Asiatic Society, 98: 1 (January, 1966), p. 19.

⁵¹ 漢·班固，《漢書》，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660。

⁵² 高榮，〈漢代張掖屬國新考〉，《敦煌研究》，2014：4（蘭州，2014.8），頁95-100。

⁵³ 高榮，〈漢代張掖屬國新考〉，頁99；另參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頁104、107-115。另一種意見以為張掖屬國所安置的族群是以匈奴為主，參見肖化，〈略談盧水胡的族源〉，《西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2（蘭州，1983.3），頁119；吳初驥、余堯，〈居延新獲建武秦胡冊再析〉，《西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4（蘭州，1984.6），頁60；李并成，〈漢張掖屬國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2（蘭州，1995.12），頁64、77；陳金生、張郁萍，〈兩漢張掖屬國述論〉，《敦煌研究》，2014：5（蘭州，2014.10），頁104。

⁵⁴ 黃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4（蘭州，1986.12），頁10。

⁵⁵ 《漢書·趙充國傳》云：「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漢·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73。另參見閔廷亮，〈小月氏考〉，頁95；李并成、斯豪強，《敦煌通史·兩漢卷》，頁164-165。

⁵⁶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5-396。

沿河西祁連山、西域崑崙山麓，生存於此的小月氏與羌人緊密結盟，漢晉文獻中所見的的湟中羌胡、盧水胡、琅（狼）何羌、牢羌與婁羌，應都是小月氏與羌人結合的部族。⁵⁷

西漢時期另有一批月氏人降漢後被安置於安定郡，⁵⁸《漢書·地理志》載安定郡下有「月（支）〔氏〕道」⁵⁹。此月氏道在三國時期仍有記載，《三國志·曹真傳》載「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⁶⁰榎一雄認為此月氏城應為前漢月氏道的後稱，月氏道的開設當是元狩二年（121 B.C.）及接下來的元狩四年（119 B.C.）因征伐匈奴漢威擴大的結果。⁶¹有關月氏道之地望，有謂在今寧夏隆德縣附近，⁶²或謂在今甘肅平涼市崆峒區，⁶³特別是瘞家溝遺址有可能即是月氏道治所；⁶⁴也有認為是在今甘肅鎮原縣東北。⁶⁵至於

⁵⁷ 初世寶，〈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頁177-178。

⁵⁸ 清人錢坫認為此月氏道「蓋以其國降人所置者也」。參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2666註釋36。李健超亦認為此地之月氏人乃西漢前葉部分月氏人降漢後入居安定郡的，參見李健超著，〈漢唐時期長安、洛陽的西域人〉，《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號（蘭州，1990.3），頁48。

⁵⁹ 漢·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頁1615。

⁶⁰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9，〈曹真傳〉，頁281。

⁶¹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4、404、414。平正的看法亦同，參見平正，〈漢魏以前固原境內的民族及其遷徙〉，《固原師專學報》，1993：2（固原，1993.7），頁78；又見葉德榮，〈漢晉時期西北地區佛教之傳播——以「羌胡」群體奉佛為線索〉，收入葉德榮，《漢晉胡漢佛教論稿》（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221。

⁶² 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頁181；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453；戴鈞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537；周振鶴認為是在寧夏固原市南與隆德縣、西吉縣交界處一帶。參見周振鶴著，《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370。

⁶³ 楊濤、黃永會、孟志平、陶榮，〈「月氏」銘貨泉銅母範〉，頁41。張德芳認為月氏當在今崆峒區以東四十里鋪，參見張德芳，〈西北漢簡中的絲綢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5（鄭州，2014.10），頁27。

⁶⁴ 張多勇，〈從居延E. P. T59·582漢簡看漢代涇陽縣、烏氏縣、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2（蘭州，2008.4），頁69-70。

⁶⁵ 桑原鷲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收入宮崎市定編，《桑原鷲藏全集·第二卷·東洋文明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27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405。

該地處置之月氏人的來源問題，究係是該處原有的月氏舊民抑或是從他處遷來的新移民？有人認為應是由他處徙置；⁶⁶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月氏道的月氏人就是當地住民，而且安定的月氏胡才是最純粹的，因張掖月氏胡是匈奴別部，而湟中月氏胡與羌族錯居後已成為雜胡。⁶⁷平正認為月氏道的月氏人雖是由他處徙置，但他同時也指出在該地早有月氏人活動於其間，月氏道隔鄰烏氏縣的烏氏戎即是月氏種的別稱，先秦時稱為禹知。⁶⁸馬非白亦認為先秦時期的「繇諸」之戎又稱繇諸、禹氏，至秦末乃名月支，皆一音之異譯也，⁶⁹故烏氏戎亦可能是月氏的別稱。⁷⁰陳連慶即認為《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秦時大商人烏氏侯所獻遺的戎王，⁷¹當即大月氏王，⁷²因此月氏道的月氏人不排除就是原本當地的住民。⁷³不僅如此，漢代見諸史籍的一些西域國族，如月氏、烏孫、塞種、大夏、單桓、龍勒（樓蘭）、焉耆與龜茲等，早先都住過河西地區，而此種遷徙活動在秦漢之際十分明顯。⁷⁴

居延漢簡曾出土過一份從長安至河西的里程簡（破城子 E·

⁶⁶ 李健超，〈漢唐時期長安、洛陽的西域人〉，頁48。

⁶⁷ 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頁28。

⁶⁸ 平正，〈漢魏以前固原境內的民族及其遷徙〉，頁78。相同的見解亦見於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75-77。

⁶⁹ 馬非白，《秦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76-477。

⁷⁰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ü-Frage," pp. 310-315; 霍古達 (Gustar Maloun) 著，艾立德 (Alexander Kais) 譯，〈關於月氏問題〉，頁216-221；趙尺子，〈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中國邊政》，5（臺北，1964.7），頁12-13；另見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文學會，1969），頁106-108。Hakan Aydemi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me Yuezhi 月氏/月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 Uyghur Studies* 1:2 (December, 2019), pp. 269-272.

⁷¹ 《史記·貨殖列傳》云「烏氏侯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卷129，〈貨殖列傳〉，頁3260。

⁷²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頁4。

⁷³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ü-Frage," p. 312, note 4; 霍古達 (Gustar Maloun) 著，艾立德 (Alexander Kais) 譯，〈關於月氏問題〉，頁218-219 註釋313。

⁷⁴ 王宗維，〈漢代河西與西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新疆社會科學》，1985：3（烏魯木齊，1985.6），頁67-79。

P·T 59.582），簡文上記載著「月氏至烏氏五十里」，⁷⁵以此度之，烏氏與月氏道位置應相去不遠，足見安定郡一帶在漢武帝（156B.C.-87B.C.，141B.C.-87B.C.在位）開河西之前，應早有月氏人在該地活動。在秦漢之際《史記·大宛列傳》曾言「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⁷⁶依此，月氏的故地當在河西走廊一帶，但也有學者如王國維主張月氏的故地本在中國正北，後來才逐漸往西移動。⁷⁷因此安定郡一帶可能至少自秦代起就有月氏人生活於其間。另外在甘肅平涼的崇信縣，於1982年時出土了一個新莽時期背面有「月氏」銘文的貨泉銅母範（「圖1」），因該處距疑為月氏道治所的瘼家溝遺址僅約10公里，⁷⁹故此一考古發現無疑說明了當地在漢代確有月氏人生活在這個區域。



圖1 甘肅平涼崇信縣出土新莽時期「月氏」銘文貨泉銅母範

資料來源：周榮，〈甘肅崇信出土「貨泉」銅母範〉，《文物》，1989：5，北京，1989.5，頁55；楊濤、黃永會、孟志平、陶榮，〈「月氏」銘貨泉銅母範〉，《中國錢幣》，2016：4，北京，2016.8，頁40-41、彩頁9，圖2。

⁷⁵ 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上》（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174；另參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頁625。

⁷⁶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2。

⁷⁷ 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收入王國維，《觀堂集林 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83），頁1156-1158。

⁷⁹ 張多勇，〈從居延E. P. T59·582 漢簡看漢代涇陽縣、烏氏縣、月氏道城址〉，頁70。

在東漢時期，小月氏人的活動主要在青海湟中地區，有關小月氏人湟中一帶的活動，《後漢書·西羌傳》有特別的記載：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逾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184），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⁸⁰

所謂「義從」，就是由外族組成的軍隊稱號，⁸¹或「歸義於漢而服從漢命」之意，⁸²而「歸義」或「義從」制度，是對比持敵對態度的羌胡少數民族而言，其重要標誌是附屬於政府統轄之下，⁸³馬長壽曾提到「義從」似乎是丁強從私有到官有的一種過渡型態。⁸⁴

「湟中義從胡」的出現始於鄧訓（?-92），⁸⁵東漢時期鄧訓曾先後擔任張掖太守及護羌校尉，因曾在羌人迷唐襲擊時開城庇護小月氏人，以恩信得到小月氏人的愛戴，《後漢書·鄧訓列傳》云：

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

⁸⁰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9。

⁸¹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129。

⁸²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400。

⁸³ 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頁171。

⁸⁴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頁88。

⁸⁵ Gustav Haloun, "The Liang-Chou Rebellion," *Asia Major* n.s., 1: 1 (1949), p. 119, note 3.

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⁸⁶

從《後漢書·西羌傳》中可看出小月氏自西漢時期降漢之後，便與漢人錯居，但仍維持其原有之部落組織，成為一支以族裔為骨幹的特殊部隊，他們並非集中在湟中地區，在河西的令居與張掖也有部眾生活於其間。⁸⁷王宗維認為小月氏在西漢之前尚未到達湟中地區，小月氏進入湟中地區的時間當在盧水胡之後，即明帝或明帝以後，不過到了章和二年（88）時，小月氏在湟中地區已經有一支相當大的力量。⁸⁸但榎一雄主張漢武帝時霍去病（14.B.C.-117B.C.）所征伐的小月氏已居於湟水流域，後來被武帝封侯的兩個小月氏王騃茲侯與軻譙侯當時應居住在湟水流域。⁸⁹東漢之時湟中一帶主要有四股政治勢力，分別是漢人、盧水胡、小月氏與羌人。⁹⁰而當地的胡族也不只一種，《後漢書·西羌傳》曾載「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⁹¹既云「諸胡」，可知湟中之胡不止月氏胡一種，但湟中羌胡其種雖雜，仍應以小月氏為主，故乃稱「湟中月氏諸胡」，因之所謂「月氏諸胡」，應是以小月氏後裔為主體，而包括了盧水胡等匈奴別部的後代。⁹²

《後漢書·鄧訓列傳》又云：「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

⁸⁶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16，〈鄧訓列傳〉，頁609-610。

⁸⁷ 榎一雄認為義從胡不僅指張掖附近的小月氏，也包括令居、湟中所有的小月氏。參見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9。

⁸⁸ 王宗維，〈漢代祁連山路考述〉，《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3（蘭州，1983.5），頁47。

⁸⁹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2-394。

⁹⁰ 吳方基，〈湟中月氏胡與「首施兩端」辨析〉，《秦漢研究》，6（咸陽，2012.8），頁237-238。

⁹¹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4。

⁹²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收入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89；許新國，〈大通上孫家寨出土「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考說〉，《青海社會科學》，1989：4（西寧，1989.8），頁73。

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⁹³其實首鼠兩端本來就是作為弱勢族群小月氏人的部族生存之道，但從東漢時期發生的多次羌人叛變事件來看，小月氏大體上對漢朝還是相當忠誠，⁹⁴有論者認為小月氏的首鼠態度是隨其主要敵人燒當羌的強弱而定，一旦燒當勢強則與漢朝結盟，燒當勢弱則採取中立。⁹⁵但這也可從側面看出小月氏雖然有羌化的趨勢，但其族群意識還是十分明顯，並未隨著退居青藏高原而選擇完全加入羌人陣營，而是謹慎地見機採取對自身最有利的結盟策略，此種強烈的族群意識也是小月氏及其後裔能在青藏高原邊緣延續生存近千年，直至五代時才消失的重要原因。

另在東漢時期據《後漢書·董卓列傳》的記載，作為小月氏後裔的「湟中義從胡」有北宮伯玉、李文侯（?-186）等人叛漢，⁹⁶這次發生於中平元年的涼州之變是以響應黃巾之亂的形式發動的，起事的主角是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與先零羌，他們以邊章（?-186）、韓遂（?-215）為軍師，一度進逼三輔，震動京師。⁹⁷而在董卓（?-192）女婿牛輔（?-192）帳下尚有名為支胡赤兒的小月氏人，⁹⁸

⁹³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16，〈鄧訓列傳〉，頁 609。

⁹⁴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67; 霍古達 (Gustav Maloun) 著，艾立德 (Alexander Kais) 譯，〈關於月氏問題〉，頁 176。

⁹⁵ 吳方基，〈湟中月氏胡與「首施兩端」辨析〉，頁 236。

⁹⁶ 《後漢書·董卓列傳》：「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劉宋·范曄，《後漢書》，卷 72，〈董卓列傳〉，頁 2320。但李文侯也有可能是漢人，參見 Rafe de Crespigny, *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 (Leiden: Brill, 2017), p. 422，中譯本參張磊夫 (Rafe de Crespigny) 著、鄒秋筠譯，《洛陽大火：公元 23-220 的後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頁 429；Wicky W. K. Tse, *The Collapse of China's Later Han Dynasty, 25-220 CE: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s and the Edge o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120，中譯本參見謝偉傑著，劉子鈞譯，《東漢的崩潰：西北邊陲與帝國之邊緣》（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頁 163。

⁹⁷ 馬長壽，《氏與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123-124。有關此次起事，另參 Gustav Haloun, "The Liang-Chou Rebellion," pp. 119-138.

⁹⁸ 《後漢書·董卓列傳》李賢注引《獻帝紀》曰：「（牛）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璣。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罽，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罽不能行，諸

在《三國志·魏志》中所提及的「友胡赤兒」，⁹⁹應為支胡赤兒之誤。¹⁰⁰《後漢書》還記載東漢末年梁冀(?-159)曾狎有一美人名曰友通期，¹⁰¹此友通期《東觀漢記》作支通期，¹⁰²友字實支字之誤，支通期當為出身月氏之胡姬。¹⁰³又1920年周炳南曾在敦煌西北玉門關遺址外之沙灘拾得漢簡17枚，據編號17木簡上「府君教敦煌畏史印 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起」之紀年，這批木簡應為東漢桓帝元嘉二年(152)之物，其中編號15疑為名籍之木簡上有「□人支誠」之字樣，此名為支誠者亦當為月氏胡人。¹⁰⁴

在東漢末年董卓麾下之強兵中，即有屬於湟中義從胡的小月氏人，《後漢書·鄭太列傳》曾載鄭太向董卓說：「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兇以赴犬羊」。¹⁰⁵《水經注》引闕駟《十三州志》云：「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¹⁰⁶若依此記載則至東漢末年時，從張掖直達湟中(西平)都有小月氏，¹⁰⁷而此時祁連山南也掌握在小月氏之手。¹⁰⁸佐藤達郎認為小月氏(義從胡)這支軍力，後來逐漸成為

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33。

⁹⁹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6，〈董卓傳〉，頁181。

¹⁰⁰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頁418；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2(烏魯木齊，1984.5)，頁25。

¹⁰¹ 《後漢書·梁統列傳》云：「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劉宋·范曄，《後漢書》，卷34，〈梁統列傳〉，頁1180。

¹⁰²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卷15，〈梁冀傳〉，頁601。

¹⁰³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373。

¹⁰⁴ 初師賓，〈關於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組漢簡〉，《敦煌研究》，1985：3(蘭州，1985.10)，頁60-61。

¹⁰⁵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0，〈鄭太列傳〉，頁2258。

¹⁰⁶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2，〈河水〉，頁48。

¹⁰⁷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3。

¹⁰⁸ 王宗維，〈漢代祁連山路考述〉，頁48。

東漢護羌校尉的私屬，最終被董卓吸收而構成其下涼州兵團的一員。¹⁰⁹余英時早年曾提出東漢將羌人徙居帝國境內的作法，最終導致了涼州等邊疆地區漢人的「胡化」，這是漢末涼州漢羌軍事集團興起的重要背景，¹¹⁰關西諸郡甚至連婦女也便習弓矢。¹¹¹《後漢書·董卓列傳》曾載漢靈帝（156-189，168-189在位）欲將董卓召回京師，但董卓卻拒絕奉召：「（中平）六年（189），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¹¹²可見當時董卓麾下的主力是湟中義從胡小月氏與秦胡兩支胡族武力，《資治通鑑》曾引鄭泰（太）所言：「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¹¹³此處明言「羌、胡義從」，顯示董卓這支羌胡兵團除羌人之外，小月氏義從胡即是胡族中的主力，¹¹⁴而董卓正是仰仗這支涼州勁旅，遂得以在漢末群雄中崛起並操控政權。

到了三國時期，諸葛亮（181-234）準備北伐，當時「涼州諸國

¹⁰⁹ 佐藤達郎，〈漢代における周辺民族と軍事——とくに属国都尉と異民族統御官を中心に〉，頁240-241。

¹¹⁰ Yü Ying-shih, "H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ed.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33. 中譯本另參余英時，〈漢朝的對外關係〉，收入杜希德、魯惟一編，韓復智主譯，《劍橋中國史·秦漢篇》（臺北：南天書局，1996），頁497。類似的意見參見陳勇，〈董卓進京述論〉，《中國史研究》，1995：4（北京，1995.11），頁113-115。

¹¹¹ 管東貴，〈漢代的羌族（下）〉，《食貨月刊（復刊）》，1：2（臺北，1971.5），頁19。

¹¹²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2。

¹¹³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著，《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59，頁1909，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正月癸酉條。

¹¹⁴ 張大可，〈試論董卓及其涼州兵團〉，《西北史地》，1985：4（蘭州，1985.12），頁21-28；王希恩，〈漢末涼州軍閥集團簡論〉，《甘肅社會科學》，1991：2（蘭州，1991.5），頁71-75、67；方詩銘，〈董卓對東漢政權的控制及其失敗〉，《史林》，1992：2（上海，1992.7），頁9-16；陳勇，〈董卓進京述論〉，頁113-115；朱子彥、呂磊，〈論漢魏之際羌胡化的涼州軍事集團〉，《軍事歷史研究》，2007：3（北京，2007.9），頁107-117。

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¹¹⁵支富應是小月氏在涼州一帶的部落酋長之一，¹¹⁶而在東漢末年擁兵割據的軍事集團部落中，應有涼州土著的月氏胡在內。¹¹⁷支富既然可以封侯，可知其轄下部眾當有一定的數量，表示河西的小月氏人尚有餘兵可支援諸葛亮之北伐，說明了小月氏人當時在河西有一定的勢力。

又三國孫吳境內當時有譯經居士名為支謙，有關其出身目前有二種說法：一云當時他是從月支國來遊漢境，於漢獻帝（181-234，189-220 在位）時避亂於吳，《高僧傳》云：「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¹¹⁸此月支國當是

¹¹⁵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卷33，〈後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頁895。

¹¹⁶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5。榎一雄也認為此月支胡侯應是小月氏人，參見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406-410；榎一雄，〈漢魏時代の敦煌〉，頁18。但馬雍認為此月支胡侯是來自中亞大月氏的移民僑居蔥嶺以東諸國而受封為侯者，參見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頁26。魏義天（É. de la Vaissière）與馮培紅也認為是來自中亞大月氏，參見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rans. James Ward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p. 61；馮培紅，〈絲綢之路隴右段粟特人蹤跡鉤沉〉，《浙江大學學報》，2016：5（杭州，2016.9），頁56。森安孝夫與關尾史郎亦認為涼州此處的月氏人是來自中亞大夏（Bactria）地區的武裝化貴霜大月氏商胡，參見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東京：講談社，2007），頁114-117；關尾史郎，〈「涼州諸國王」と蜀地方〉，《東洋學術研究》，59：2（東京，2020.12），頁76-77；關尾史郎，《三國志拾遺 続——文献と文物の間》（横須賀：Nakazato Labo，2022），頁220。關尾史郎後來更進一步認為此處之月支實際上應是印度系的貴霜人，參見關尾史郎，《周縁の三國志——非漢族にとっての三國時代》（東京：東方書店，2023），頁155；關尾史郎，《三國志拾遺 補——東アジア・石刻ほか》（横須賀：Nakazato Labo，2023），頁179。滿田剛認為此處裴注所引《諸葛亮集》之月支（月氏），土著月氏說與東遷月氏說皆有可能，參見滿田剛著，〈蜀漢・諸葛亮の北伐戦略と隴西・河西回廊の非漢族について——後漢・三國期の羌・「涼州諸國王」〉，《東洋哲学研究所紀要》，33（東京，2017.12），頁161。余太山主張此處所謂的「涼州諸國王」，實指蔥嶺以東南北道諸綠洲國之國王而非河西涼州本土，參見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11。

¹¹⁷ 陳國燦，〈魏晉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與火祿教〉，頁198-199。

¹¹⁸ 南朝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譯經上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支謙〉，頁14-15。

中亞的大月氏；¹¹⁹一說支謙之祖父支法度於漢靈帝時率其國人數百歸化中國，若按此說支謙祖父雖來自中亞大月氏國，但他自幼應是在漢境成長。¹²⁰另支法度曾拜率善中郎將，《出三藏記集》稱其「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數百國人歸化，拜率善中郎將」，¹²¹說明當時這批月氏人可能擁有一定之武力。在東漢末年，確實有不少大月氏人從中亞來到中國，¹²²其中即包含不少的佛僧，如支樓迦讖（支讖）、支曜、支亮，成為早期佛教東傳漢土的重要推手。然黃盛璋對法度自大月氏歸化之說存疑，他認為支胡若由大月氏遷來，似不可能支胡部落有如此之多，如出自湟中月氏胡，則較易獲得解釋。¹²³西晉時尚有高僧竺法護（239-316.）者，被稱為「月支菩薩」，¹²⁴《高僧傳》稱「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¹²⁵既云其世居燉煌，則亦有可能為小月氏人。¹²⁶

在西晉時期，於永嘉三年（309）曾有支胡五斗曾起兵響應劉芒蕩（?-309）的叛變。《晉書·懷帝紀》云：

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眾數千為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元海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并州刺史劉琨

¹¹⁹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頁22。

¹²⁰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74-75。

¹²¹ 南朝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13，〈支謙傳〉，頁516。

¹²² 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33-67；林梅村，〈洛陽所出法盧文并欄題記——兼論東漢洛陽的僧團與佛寺〉，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頁387-404；陳曉露，〈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人〉，《邊疆考古研究》，19（長春，2016.6），頁207-221。

¹²³ 黃盛璋，〈雜胡官印考〉，頁274。

¹²⁴ 南朝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卷7，〈魔逆經記第十五〉，頁274。

¹²⁵ 南朝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1，〈晉長安竺曇摩羅刹（竺護法）〉，頁33。

¹²⁶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7。

使兵救之，為聰所敗。¹²⁷

此處的「支胡五斗叟郝索」唐長孺等人認為應釋為支胡人五斗和叟人郝索，¹²⁸然陳連慶等學者則主應斷為「支胡五斗叟、郝索」，而五斗叟、郝索皆支胡人，支胡中亦有郝氏。¹²⁹五斗、郝索等人有能力在長安附近以數千人呼應劉芒蕩起事，足見該地有為數眾多的支胡屬集。¹³⁰這些月氏人後裔多被稱為支胡，實月氏胡之簡稱，¹³¹因月氏即月支，¹³²故月支胡省作支胡。¹³³桑原鷺藏指出除僧侶之特別情況外（如弟子繼承師僧之姓），支姓皆限於出身月支者，¹³⁴羽溪了諦也表示西域人之冠有支姓者，與月氏必有關係，蓋無疑義。¹³⁵來自月氏的僧人或居士也大都以「支」為姓，連帶跟他們學習佛法的中原弟子或居士，也隨他們姓支。¹³⁶月氏人以支為姓應是東漢中後期之事。¹³⁷

2003年在河南偃師發掘了一座永康元年（300）的西晉墓，墓中出土一塊銘文磚，其上刻有「永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

¹²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懷帝紀〉，頁119。

¹²⁸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9；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273、275；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129。另見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20；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409。

¹²⁹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19、378；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6；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72；霍古達（Gustar M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頁181。

¹³⁰ 李健超，〈漢唐時期長安、洛陽的西域人〉，頁48。

¹³¹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頁20。但李志敏的見解不同，他主張支胡實即魏晉史冊中之秦胡，參見李志敏著，〈支胡考——兼談秦胡在史冊消失問題〉，《西北民族研究》，1995：1（蘭州，1995.6），頁111-116、75。

¹³²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405。

¹³³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9。但馬雍強調凡以支為姓者皆指從中亞貴霜王國遷來的月氏僑民，參見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頁23。

¹³⁴ 桑原鷺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頁347。

¹³⁵ 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87。

¹³⁶ 尚永琪，〈漢晉時期的月氏僧人〉，收入尚永琪，《胡僧東來——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家與傳播人》（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25。

¹³⁷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頁23；楊富學、袁煒，〈在華月氏人「以國為氏」考〉，《青海師範大學學報》，45：2（西寧，2023.3），頁18-24。

伯姬喪」等17字銘文（「圖2」），墓主及其夫可能為西域胡人或胡人後裔，有論者認為墓主夫婦為來自安國之粟特胡人與月氏胡人之家庭，¹³⁸然從女性墓主姓支來看，實不能排除其為小月氏的可能性。另在西晉傳世官印中，有兩枚屬於支胡之官印，一作「晉支胡率善仟長」，另一作「晉支胡率善佰長」（「圖3」）。支胡既被賜為「仟長」，證明當時支胡為較大的部落，從晉以來渭北一帶的支胡部落或來自河西、湟中南遷的小月氏。¹³⁹按「仟長」本為匈奴傳統部落之職官，即千夫長，《史記·匈奴列傳》云：「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¹⁴⁰小月氏人能被封為仟（夫）長，顯示其轄下之壯丁人數當至少在千人以上，故由此推估其歸附部落人口之規模至少當有四、五千之眾。



圖 2 河南偃師西晉支伯姬墓出土之銘文磚

資料來源：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西晉支伯姬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3，北京，2009.3，頁40。

¹³⁸ 商春芳，〈洛陽博物館藏「晉歸義胡王」金印與絲綢之路上的民族往來〉，收入商春芳著，《洛陽考古與絲綢之路人文交流》（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頁73。

¹³⁹ 黃盛璋，〈雜胡官印考〉，頁9-10。

¹⁴⁰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91。



圖3 「晉支胡率善佰長」印（左）與「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右）

資料來源：陳介祺編，《十鐘山房印舉》，北京：中國書店，1985，舉之二，〈官印22〉，頁71。最早舉出支胡此二官印史料的是霍古達，參見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73；霍古達（Gustav M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頁181

下迄十六國時期，活動於華北的月氏遺胤屢見於史冊，如前趙主劉曜（?-329，318-329在位）時有都水使者名為支當，以直諫見殺。¹⁴¹後趙石勒（274-333，330-333在位）集團早期的核心份子十八騎中有支屈六、支雄等人，皆月氏（支）人，¹⁴²榮新江認為其中支雄可能出自早在漢武帝時即降漢封於琅邪的小月氏王騃茲侯稽谷姑，¹⁴³蓋唐代支氏墓誌中的支成墓誌有云「後趙司空始安郡公，曰雄，瑯耶人也」，不過有學者認為可能只是攀附假托。¹⁴⁴《晉書·石勒載記》另有一張屈六者，¹⁴⁵周家祿認為應即支屈六之誤，¹⁴⁶沈騫據此認為「支」，「張」可以互轉，二者可能同指一

¹⁴¹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03，〈劉曜載記〉，頁2699。

¹⁴² 有關十八騎之考證，參見小野響，〈石勒十八騎考——後趙政權の基礎的理解に向けて——〉，《立命館文學》，657（京都，2018.3），頁11-31；又見小野響，《後趙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20），頁164-174。

¹⁴³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6-57。

¹⁴⁴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收入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331，該墓誌之釋文參見頁335。支氏墓誌之相關研究另參見翁育瑄，〈唐代後期支疎家族研究〉，《漢學研究》，40：4（臺北，2022.12），頁73-120。

¹⁴⁵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04，〈石勒載記〉，頁2730。

¹⁴⁶ 清人周家祿《晉書校勘記》認為張屈六即十八騎中支屈六，張聲之誤也。參見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109；蘇慶彬，《兩漢迄五代入居中國之蕃人氏族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頁239。小野響認為二人應為同族。參見小野

姓，故十八騎中的張姓也有可能是小月氏人。¹⁴⁷按石勒之十八騎中，張姓者計有張噎僕、張越二人，姚薇元疑此「張」姓乃「羌渠」之諧聲，此二人應為羯族。¹⁴⁸另石虎（295-349，334-349 在位）時，其下有一將領（相）名支重，¹⁴⁹應該也是月氏人。從石勒初起時的核心集團十八騎中即至少有兩名月氏胡來看，羯族出身的石勒與月氏人之關係頗值得留意。姚薇元即認為羯族實乃匈奴統治下之月氏族，主張羯族即月氏。¹⁵⁰沈騫則以為羯胡雖是一種雜胡，其中包含了羌化月氏胡、西羌、屠各等，但主要成分應是羌化月氏胡和其雜處的西羌。¹⁵¹雖然東漢末年也有大月氏人以部落形式內遷者，¹⁵²但漢晉時期這些以支為姓的月氏人應多為小月氏的後裔，而非都來自西域中亞的大月氏。張葳在研究了唐代的支氏墓誌後認為，墓誌中提到的支氏先祖有三位，分別是支雄、支陸與支道林。其中支雄與支陸應皆為後趙將領，表明唐代活動在中原地區的小月氏後裔可能主要是由後趙政權中的胡人發展而來。¹⁵³

響，〈石勒十八騎考——後趙政權の基礎的理解に向けて——〉，頁15；另參小野響，〈後趙史の研究〉，頁171。

¹⁴⁷ 沈騫，〈河西小月氏、盧水胡與河東羯胡關係探源〉，頁134。

¹⁴⁸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385-386；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382；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109；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5：1（嘉義，1994.10），頁193；同樣的看法另參李智文，〈石勒評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頁23。但針對此說，小野響認為無直接證據。參見小野響，〈石勒十八騎考——後趙政權の基礎的理解に向けて——〉，頁14-15；另見小野響，〈後趙史の研究〉，頁169-170。

¹⁴⁹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8，〈穆帝紀〉，頁195言其為「石季龍將」；但卷93，〈外戚傳·褚裒〉，頁2416又言其為「偽相」。

¹⁵⁰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382-385。但榮新江不同意姚氏之說，他認為羯胡只能說是雜胡，參見榮新江著，〈小月氏考〉，頁51。

¹⁵¹ 沈騫，〈河西小月氏、盧水胡與河東羯胡關係探源〉，頁142。

¹⁵² 「（支謙）大月氏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南朝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卷13，〈支謙傳〉，頁516；另參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18。

¹⁵³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民族研究》，2012：5（北京，2012.9），頁72。

此外，在新疆樓蘭所出土東漢至十六國時期的簡牘文書中，多次出現以支為姓的胡人名字，如兵胡支鸞（LA. II .ii.239）、胡支得（LA. II .ii.293）、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LA. VI.ii.04.434）、兵支胡管支（LB.IV.i.2.604）等胡兵姓名，尼雅遺址出土的過所木簡另有「月支國胡支柱」的名字（N.V.Nxv.34.673）。¹⁵⁴有人認為這些月氏兵應出自小月氏，¹⁵⁵但也有認為是出自大月氏，¹⁵⁶其中部分的支姓漢文名字都可在佉盧文書（Kharoṣṭhī documents）中找到對應的佉盧文人名。¹⁵⁷由於樓蘭位於敦煌之西方，因此就地緣關係來看，這些支姓月氏兵出自小月氏的可能性應比較高。至於尼雅過所木簡中的支柱是來自月支國，此月支國究係是中亞的大月氏或河西的小月氏，目前還難以判斷。

又三國時期在涼州另有名為治元多（?-221）¹⁵⁸與治無戴者，治無戴還被稱為「涼州名胡」、¹⁵⁹「涼州胡王」。¹⁶⁰王宗維主張「支、治」實一音之轉，¹⁶¹霍古達認為從治無戴是自令居造反一事來看（令居為東漢時小月氏聚居地），治無戴應還是屬於當地的小月氏。¹⁶²故月氏人除以支為姓外，可能亦有以治為姓者，¹⁶³或未可知。

¹⁵⁴ 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53、56、67、78、86。

¹⁵⁵ John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 3 (1965), p. 606; 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8-59。

¹⁵⁶ 陳曉露，〈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人〉，頁212。

¹⁵⁷ John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p. 606.

¹⁵⁸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15，〈張既傳〉，頁474。該傳稱「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婁、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¹⁵⁹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26，〈郭淮傳〉，頁492。

¹⁶⁰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卷33，〈後主傳第三〉，頁898。

¹⁶¹ 王宗維，〈盧水胡與小月氏〉，頁104。

¹⁶²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 272; 霍古達（Gustar M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頁181。

¹⁶³ 馮霞，〈論月氏入華的幾個重要問題〉，頁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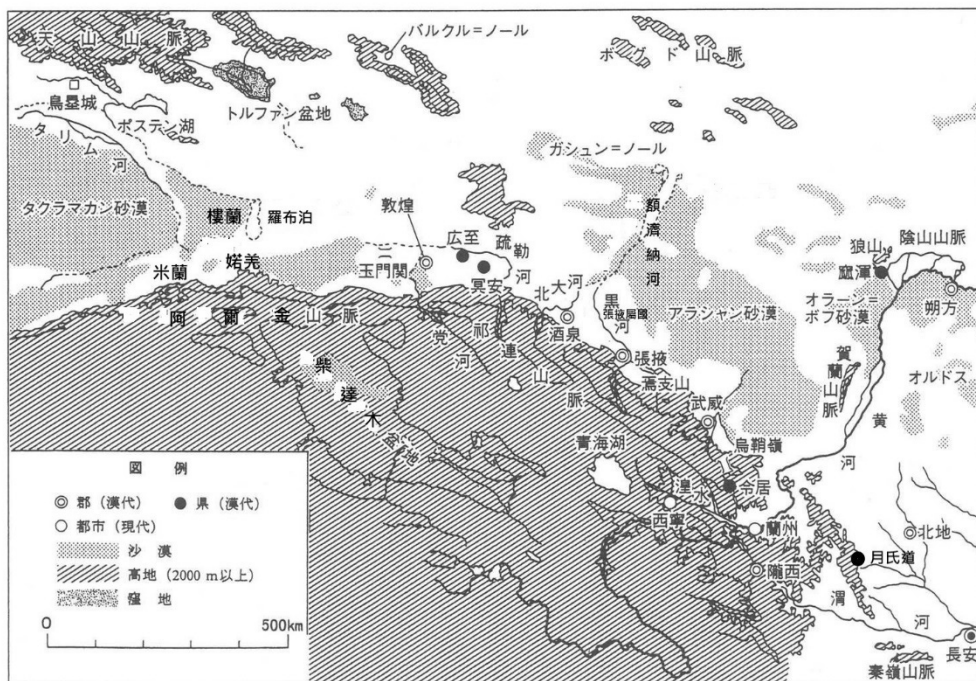


圖 4 小月氏主要活動區域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初山明，《漢帝国と辺境社会：長城の風景（増補新版）》，市川：志學社，2021，圖 9。

三、從族群數量看小月氏在河西非漢族群中的地位

月氏西遷至中亞後，據《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載，其「控弦者可一二十萬」，¹⁶⁵此處云「控弦者」，看來應未包含其下所臣服的原綠洲大夏居民，因司馬遷（145B.C.-86B.C.）在該傳中另有對大夏的人口記錄「可百餘萬」，¹⁶⁶陳良佐推測在 128 B.C.張騫（?-114B.C.）停留於大月氏時，其本族的人口不會少於四十萬，而回推其在河西故地時期的人可能在 45 萬至 50 萬之間，月氏絕非小國寡民之國。¹⁶⁷月氏後來雖然西遷，但一個部族的移徙不可能將其全族人口悉數遷走，故停留在河西故地一帶的月氏人可能尚有

¹⁶⁵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4。

¹⁶⁶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1。

¹⁶⁷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頁9-10、18。

不少，以下試推算之。

在兩漢時期，有為數不少的小月氏人仍生活在河西一帶，漢代河西的小月氏主要分布在陽關西南、張掖郡南部盧水流域和湟中、令居等三個地區。¹⁶⁸陳良佐認為兩漢時因來降而封侯的異族，其所封戶數之多寡與來降者的地位及帶來的人數有關。神爵二年（60 B.C.）以前封侯的標準相當一騎一戶，而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的記錄，騶茲侯稽谷姑是封 1,900 戶，而輒譟侯杆者是率千騎降封 760 戶，¹⁶⁹因稽谷姑受封的戶數為杆者的 2.5 倍，依此回推稽谷姑應是率 2,500 騎降漢，故這兩個在漢武帝時來降的小月氏王共率 3,500 騎降漢，以口和壯丁之比為五比一計算，他推估這批降漢之小月氏人數應有 17,500 人。¹⁷⁰王宗維也分析當時在河西一帶的小月氏主要有酋涂（酒泉）王部、輒譟（呼蠶）王部、右苴王部與狼何部，總數將近萬人。¹⁷¹《漢書·霍去病傳》的記載或許可以推估西漢時小月氏的人口梗概，其傳云：

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樂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¹⁷²

¹⁶⁸ 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頁 26。

¹⁶⁹ 漢·班固，《漢書》，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 660。

¹⁷⁰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頁 16-17。高榮的估計是約 15,000 人，參見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頁 114。秦鐵柱的研究認為從匈奴歸義列侯受封的戶數來看，元狩二年之後為率八千人投降受封兩千戶。參見秦鐵柱，〈西漢時期匈奴歸義列侯論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9：10（商丘，2013.10），頁 55-56。

¹⁷¹ 王宗維，〈秦漢之際河西地區的民族及其分布〉，頁 92-93。但武沐認為酋涂王部之「酋涂」並非王宗維所言的「酒泉」，乃「休屠」之同名異讀，參見王宗維著，〈渾邪休屠族源探蹟〉，頁 13-14。

¹⁷² 漢·班固，《漢書》，卷 55，〈霍去病傳〉，頁 2480-2481。

霍去病此次攻擊的地點是祁連山下之小月氏，共斬獲了30,200人，雖然表面上看來其所虜降者主要是匈奴人，但從「遂臻小月氏」與「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兩句來看，此次所擊之匈奴所部實為小月氏人，可能是當時匈奴派人（渾邪王或休屠王）統治當地未西遷的小月氏人。¹⁷³蓋前節曾述西漢時有名為「月氏」者封親陽侯，其身分為匈奴降相，可見月氏雖遭匈奴擊潰而遠遁中亞，但仍有部分未遷徙的月氏人投降後選擇加入匈奴並為其所用，從而累官至匈奴相（應係渾邪王或休屠王轄下之相）。故此次斬獲的對象可能主要是小月氏人而非匈奴部眾，且從斬首¹⁷⁴三萬餘人來看，留在祁連山附近的小月氏人口總數應遠超過此數，可見未西遷的小月氏人數量其實不少，若以斬首為男丁計算，古代壯丁與人口的比率为—與四至五之比（詳下），霍去病所攻之小月氏部人數當有十二萬人左右。

在此之前小月氏人是與南山羌結盟並同匈奴遙相呼應，給漢朝帶來相當的困擾，此種情況一直要等到霍去病攻下河西走廊，漢朝在此設河西四郡後才有所改善。《漢書·西域傳》班固贊云：「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¹⁷⁵此處之月氏指的應是未西遷的小月氏。從小月氏尚能給漢朝造成困擾這點來看，小月氏當時應還維持一定的族群數量，否則不可能會對漢朝構成威脅。

¹⁷³ 陳世良已指出匈奴渾邪部實為小月氏，參見陳世良，〈渾邪考〉，頁44-46；王宗維也認為此次所擄獲之首涂王應是小月氏一部落王，時為匈奴管轄，參見王宗維，〈匈奴諸王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2（呼和浩特，1985.5），頁17-18。

¹⁷⁴ 對於前引《漢書·霍去病傳》之「捷首虜三萬二百」一句，《史記》記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卷111，〈衛將軍驃騎列傳〉，頁2931；《漢書·匈奴傳》則記為「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參見漢·班固，《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頁3768。故此句所言應是斬首之數字，而非斬首與俘虜人數之合稱。

¹⁷⁵ 漢·班固，《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頁3928。

在漢宣帝（91B.C.-48B.C.，74B.C.-48B.C.在位）時期，陽關西南尚有一支以狼何為首的小月氏種人，《漢書·趙充國傳》云：

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¹⁷⁶

狼何既稱羌侯，顯然曾經歸順過漢朝，疑為歸義羌侯之略稱，¹⁷⁷但後來又再度反叛。但趙充國（137B.C.-52B.C.）亦曾同時徵發婁、（小）月氏兵四千人應付羌人，《漢書·趙充國傳》云：「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候〕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¹⁷⁸陳良佐曾據近代人口學家的意見，推估古代壯丁與人口的比率為一與四至五之比，加之參照匈奴與西域的勝兵與人口比率，推算人口與兵力比約為一比四至五，¹⁷⁹對照《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南匈奴於永元二年（90）時的戶口數：「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¹⁸⁰其兵力與人口之比正為 4.7 左右，或可作為佐證。王宗維認為若以每族（婁、月氏）兩千計，小月氏人口已在萬人以上。¹⁸¹不過趙充國此次所徵發的究竟只是陽關西南的小

¹⁷⁶ 漢·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73。

¹⁷⁷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頁395。雷家驥認為狼何是羌化小月氏的領袖，參見雷家驥，〈氐羌種姓文化及其與秦漢魏晉的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6：1（嘉義，1995.12），頁182。王明珂指出西漢勢力到達河西走廊之後，張掖、酒泉一帶一度被視為是所謂的「羌中」，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205-207。

¹⁷⁸ 漢·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80。

¹⁷⁹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頁16-17。

¹⁸⁰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9，〈南匈奴列傳〉，頁2953-2954。

¹⁸¹ 王宗維，〈盧水胡與小月氏〉，頁101。

月氏，抑或是河西張掖、酒泉一帶的小月氏？從史料的描述來看，小月氏是與婁羌一起被徵，因此是陽關西南的小月氏可能性較大些。若光是陽關西南一帶的小月氏便有近萬人，可知小月氏當時的族群數量仍然不少。不過從中也可得知這時陽關西南一帶的小月氏人可能並非都參與狼何的叛變，仍有繼續聽令於朝廷者，蓋懸泉漢簡中即有狼何羌為漢廷所用的紀錄：「敦煌太守快使守屬充國送牢羌、□□羌侯人十二。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琅何羌□□彊藏□□□行在所，以令為駕二乘傳，十一月辛未皆罷。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I 0210 ③：6）。¹⁸²此簡言敦煌太守下令護送牢羌、琅（狼）何羌侯共十二人謁皇帝所在之處，初世賓從懸泉漢簡簡文認為狼何小月氏雖曾從羌人叛變，但戰爭結束後他們並未被漢朝當作敵人，反而成為朝廷爭取的對象。¹⁸³

總之在西漢時期，從降漢的小月氏人數即有一萬七千餘人，以及光是陽關西南的小月氏也有萬名左右來看，西漢時河西之小月氏人口已近三萬。倘將霍去病所攻滅之祁連山下匈奴部也視為小月氏來推估，這十二萬人扣除被漢軍斬首的三萬人，則其餘眾當尚有九萬，再加上陽關西南的一萬眾，則西漢時期河西一帶的小月氏人口可能一度曾有過十萬之眾。

再來看東漢時期，據《後漢書·西羌傳》之記載，陳良佐推估當時小月氏的人口有五萬人左右，¹⁸⁴同一史料人口史學者路遇等人也有相同數目的推估。¹⁸⁵據《後漢書·竇融傳》載：「（建武）八年（32）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¹⁸⁶從竇融

¹⁸²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162。

¹⁸³ 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頁174。

¹⁸⁴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頁17；但支靜的推估較低，她估計約為三萬多人，參見支靜著，〈小月氏歷史考述〉，頁17。

¹⁸⁵ 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157。

¹⁸⁶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23，〈竇融列傳〉，頁805-806。

(16B.C.-62) 部隊中的羌胡與小月氏聯軍可達數萬人一事來看，若小月氏兵僅以一萬計，小月氏人在兩漢之際的人口數當至少有四、五萬之譜。

《後漢書·西羌傳》曾云湟中一帶的小月氏人勝兵有九千餘人，若以一戶四人計，其人口數約三萬餘人，¹⁸⁷若以五人計，則超過四萬餘人，霍古達更推估應有五萬人左右，而這還僅是小月氏東南諸部的數量，以湟中當地而言其族群數量已頗為可觀，¹⁸⁸足見小月氏人的數量光在青海湟中一帶應至少約有四萬人，數量不容小覷。另前引《後漢書·鄧訓列傳》曾云此居塞內之小月氏有「勝兵者二三千騎」，¹⁸⁹應是前述《後漢書·西羌傳》所言分居於令居或張掖者，王宗維主張漢代少數民族勝兵數大致接近戶數，或略高，他推估當時湟中小月氏約為二千餘戶，因此認為〈西羌傳〉所載「勝兵九千餘人」是東漢末年的數字。¹⁹⁰若以一戶四口勝兵2,500騎來推估，此股分居在河西塞內的小月氏勢力當有萬人之眾。湟中小月氏人口若以四萬計，而塞內（此處應指河西一帶）之小月氏人以一萬計的話，當時河西、湟中一帶的小月氏人數應接近陳良佐所估計的五萬人，顯見小月氏人在東漢時仍維持一定的族群數量。

在兩漢之際群雄並爭時期，河西一帶曾是當時難得的淨土，《後漢書·孔奮列傳》云：「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¹⁹¹然在漢末至西晉之間，由於天下大亂，人口銳減，漢末時金城當地曾一度「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¹⁹²小月氏的族群數量是否受到亂世影響不得而知，加上此時期小月氏的人口數

¹⁸⁷ 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頁24。

¹⁸⁸ Gustav Haloun-Göttingen, "Zur Üe-tsi-Frage," pp. 268-269; 霍古達 (Gustar Maloun) 著，艾立德 (Alexander Kais) 譯，〈關於月氏問題〉，頁178。

¹⁸⁹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6，〈鄧訓列傳〉，頁609。

¹⁹⁰ 王宗維，〈漢代祁連山路考述〉，頁48。

¹⁹¹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31，〈孔奮列傳〉，頁1098。

¹⁹²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16，〈蘇則傳〉，頁491。

因史料未載，故較難做出推估。不過從史冊上留下如此眾多以支為姓的小月氏人來看，小月氏人口應還是保有一定的數量。

依朱大渭的研究，十六國北朝融入漢族的少數民族有十餘個，人口總數約有 11,361,980 人，占北朝國家領民的 35%，¹⁹³足見在民族大移徙時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在當時人口中占有的比例其實不低。要瞭解小月氏人在漢晉時期羌胡中的族群地位，觀察其在西北地區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或許是一個側面理解的可能途徑。西晉時江統 (?-310) 在其著名的〈徙戎論〉中，在提及關中地區龐大的戎狄數量時曾說「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¹⁹⁴依江統的觀察，戎狄人口比例已占關中總人口數之近半，足見當時西北一帶外族人口之盛。小月氏雖未躋身傳統魏晉所謂「五胡」之列，但其總人口數仍不容忽視，我們可嘗試推估漢晉時期小月氏人在河西一帶的人口占比。自漢武帝時期取得河西地區以後，便開始在此地實施大規模的移民，移民數量可考的即達八十二萬五千，至平帝元始二年 (2) 時，這八十多萬人的後裔已達一百二十萬。¹⁹⁵此間有一問題，即史料中所載的戶口數，究竟有無包括歸降的少數民族？一種意見認為匈奴、羌等少數民族內遷後，並沒有被列入戶籍，¹⁹⁶羌人在西晉前仍為部民而非編戶，¹⁹⁷這些降漢所謂「歸義」的少數民族並不納租賦，所以未編入戶籍，因此《漢書·地理志》所載的河西地區人口，實際上並不包括當地已經「歸義」的羌胡、小月氏等少數民族部眾，僅指當地從內地遷入並承擔租賦徭役的漢族人口。¹⁹⁸但也有

¹⁹³ 朱大渭，〈儒家民族觀與十六國北朝民族融合及其歷史影響〉，《中國史研究》，2004：2（北京，2004.5），頁42、55；此處所統計之11,361,980人可另參見朱大渭，〈魏晉十六國北朝北方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總人口數估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4（北京，2007.8），頁270。

¹⁹⁴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56，〈江統傳〉，頁1533。

¹⁹⁵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193。

¹⁹⁶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 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423；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頁157。

¹⁹⁷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研究》，頁95。

¹⁹⁸ 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頁9、40；

主張歸義的少數民族其實已納入官方的戶籍資料，如陳勇認為當時隴右所謂漢族人口，實際上包含許多脫離本部族而在郡縣注籍的少數族人口，¹⁹⁹黎明釗從敦煌懸泉漢簡的資料分析，也認為當時歸義的外族必須向所在的郡縣機構或屬國登記名籍。²⁰⁰總之目前除了兩漢屬國人口的紀錄之外，似乎還未能確定在漢晉正史地理志所載的郡國人口數中，是否已經將歸義的少數族群包含在內。

以西漢時期而言，河西主要屬涼州之地，但由於班固（32-92）在編撰《漢書·地理志》時並未以州為綱、以郡為目來書寫，使讀者對於州郡間的轄屬無法一目了然，²⁰¹依周振鶴、辛德勇等人的看法，涼州地域範圍大致為隴西、金城、天水、安定、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八郡。²⁰²據《漢書·地理志》所載此八郡之漢族總人口數在西漢末年為1,071,325人（「表1」）。²⁰³前文已說明西漢時期降漢的小月氏人計有17,500人，而陽關西南的小月氏

齊陳駿主編，《西北通史·第二卷》，頁71。

¹⁹⁹ 陳勇，〈東漢涼州「羌胡化」述論〉，收入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71註釋2。

²⁰⁰ 黎明釗，〈懸泉置漢簡的羌人問題——以《歸義名籍》為中心〉，《九州學林》，34（香港，2014.6），頁22、30、39。薛海波亦認為西漢政府曾對河西地區的降羌登記造冊，參見薛海波著，〈試論敦煌懸泉漢簡中的羌〉，《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5：3（通化，2004.3），頁43。

²⁰¹ 顧頡剛，〈兩漢州制考〉，收入顧頡剛，《顧頡剛全集5·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83註釋1。

²⁰²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頁478；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40；譚其驤所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採取此種見解，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秦·西漢·東漢時期》（北京：地圖出版社，1985），頁33-34。但也有不同意見，如呂祖謙認為西漢時涼州實領九郡（多納北地郡），顧頡剛則認為涼州有十郡（多納武都、北地二郡）。參見顧頡剛，〈兩漢州制考〉，頁171-173。

²⁰³ 有關《漢書·地理志》所載之年代斷限，一說主張為平帝元始二年（2），如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頁17-22；一說主張為成帝元延、綏和之際或曰元延三年（10B.C.），如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22-24；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79-84；另參見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頁103。

也有萬名左右，合此兩支小月氏部眾便約有 27,500 人，以此保守估算，則小月氏人約占當時涼州人口的百分之 2.6 左右。但若將前述霍去病所攻滅之祁連山下小月氏部原有十二萬口列入，即便經過霍軍斬首三萬，西漢時期留在河西一帶的小月氏人口仍可能有十萬之眾，如此則小月氏人占當時涼州人口的百分比即可能達到約百分之 9.3。

而東漢時期，依《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在東漢中晚期，²⁰⁴涼州所轄十郡兩屬國的漢族總人口數約為 47.5 萬人（「表 2」），²⁰⁵與《漢書·地理志》所載西漢時期的當地人口數相比，總人口數的下降幅度頗高。勞榦認為東漢時西北邊郡人口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王莽（45B.C.-23，9-23 在位）與東漢初年的邊警，而光武竟徙民於內地造成邊郡更加空虛，東漢匈奴之患雖減，而羌禍又發，在

²⁰⁴ 有關司馬彪所著《後漢書·郡國志》年代之斷限，一般認為是以順帝永和五年（140A.D.）為斷，參見萬國鼎，〈漢以前人口及土地利用之一斑〉，《金陵學報》，1：1（南京，1931.5），頁 138；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14-15；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頁 601-602。

²⁰⁵ 《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敦煌郡戶數疑有脫落，僅 748 戶卻有口 29,170 人，平均每戶 39 人，較之涼州其他諸郡之比例顯不合理，此點高榮已指出，參見高榮，《先秦漢魏河西史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頁 249；劉光華則認為敦煌郡戶數應為 7,048，參見劉光華著，〈建郡後的漢代河西〉，《敦煌學輯刊》，1981：2（蘭州，1981.12），頁 98。因此若不計敦煌郡，則涼州平均每戶為 4.4 人。又《後漢書·郡國志》所載涼州諸郡之人口數中，獨缺酒泉郡，僅載其戶數為 12,706，今同樣以一戶 4.4 人計，粗估酒泉郡人口數為 55,906，與其他九郡兩屬國人口數合計共得 475,174 人。先前劉光華曾推估過酒泉郡人口約 50000，參見劉光華著，〈建郡後的漢代河西〉，頁 98；汪受寬則取武威、張掖、敦煌三郡之平均，以每戶 3.716 人計，推估酒泉郡人口數為 47,215，參見汪受寬，《甘肅通史·秦漢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頁 332。謝偉傑的書中亦曾統計過兩漢時期的涼州人口數，但是經查其統計數據其實有誤，其總戶數與總人口數之數據均出現不小的誤差。參見 Wicky W. K. Tse, *The Collapse of China's Later Han Dynasty, 25-220 CE: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s and the Edge of Empire*, p. 45，中譯本參見謝偉傑著，劉子鈞譯，《東漢的崩潰：西北邊陲與帝國之邊緣》，頁 63。陳勇亦曾統計過東漢時涼州總人口數為 433,000，但陳勇錯將酒泉戶數記為 2,760 戶（實為 12,706 戶），其以一戶五口計而得出之酒泉郡人口 13,800 人實則有誤，蓋少計一萬戶的結果使總人口數的估計便少了近 4-5 萬之多。參見陳勇著，〈東漢涼州「羌胡化」述論〉，頁 171 註釋 1。

此摧殘後西州元氣終漢之世不復。邊境人口漸減的結果是不能自守，所以不得不利用羌胡鮮卑間的矛盾來行以夷制夷之計，以致後來乃有董卓擁羌胡兵入洛之禍，甚至五胡亂華亦種因於此。²⁰⁶葛劍雄認為東漢時期的戶口記錄有嚴重失實的現象，其準確性總體上不如西漢，²⁰⁷高榮則言東漢時河西世家大姓的部曲人口往往被隱匿而不著戶籍，故《後漢書·郡國志》的戶口數未必能真實反映當時的河西人口狀況，但東漢河西人口不及西漢盛時當是可信的，²⁰⁸然即使如此，《後漢書·郡國志》上的戶口數仍是目前唯一能夠使用且較為可靠的資料。²⁰⁹而若以前述東漢時期小月氏的人口估計至少五萬眾來看，則小月氏人約占東漢時期涼州漢族人口的百分之 10.5 左右，人口比重較之西漢明顯增加，這當是肇因於涼州戶口數較之西漢下降超過一半之故。

表 1 西漢 (2 A.D.) 涼州人口統計表

郡名	戶數	人口數
隴西	53,964	236,824
金城	38,470	149,648
天水	60,370	261,348
武威	17,581	76,419
張掖	24,352	88,731
酒泉	18,137	76,726
敦煌	11,200	38,335
安定	42,725	143,294
小計	266,799	1,071,325

資料來源：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8，〈地理志下〉，頁 1610-1616。

²⁰⁶ 勞幹，〈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收入勞幹，《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15-16、18。

²⁰⁷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 399-400、408。

²⁰⁸ 高榮，〈漢代河西人口蠱測〉，《甘肅高師學報》，5：1（蘭州，2000.2），頁 63。

²⁰⁹ 萬國鼎嘗言「兩漢書所記戶口，未必盡實，蓋當時戶與口均有稅，不無隱匿也。然以平均計之尚離事實不遠，要無害於疏密轉變之比較也。」參見萬國鼎，〈漢以前人口及土地利用之一斑〉，頁 144。

表 2 東漢（140 A.D.）涼州人口統計表

郡（屬國）名	戶數	人口數
隴西	5,628	29,637
漢陽	27,423	130,138
武都	20,102	81,728
金城	3,858	18,947
安定	6,094	29,060
北地	3,122	18,637
武威	10,042	34,226
張掖	6,552	26,040
酒泉	12,706	55,906 (以每戶 4.4 人計)
敦煌	748	29,170
張掖屬國	4,656	16,952
張掖居延屬國	1,560	4,733
小計	102,491	475,174

資料來源：劉宋·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志 23，〈郡國五〉，頁 3516-3522。

再來是魏晉時期，自東漢末年以至魏晉，隴右地區因戰亂不休和歷代統治者的強迫遷徙，人口已大大地減少。²¹²此時期據《晉書·地理志》的資料，兩漢時期涼州政區所轄的各郡又有若干的調整，部分原屬涼州的政區改劃入秦州與雍州。改劃歸秦州的計有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等郡，秦州轄下諸郡只有陰平郡非原涼州屬郡，²¹³而安定、北地二郡則改隸雍州。因此若依《晉書·地理志》的戶口統計資料，涼州共30,700戶，若同樣以東漢時期前估的一戶 4.4 人計，則魏晉時涼州人口數共約 135,080 人。另有關秦州的總人口數，《晉志》在描述秦州時，於開頭處

²¹² 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頁93。

²¹³ 《晉書·地理志》云陰平本屬梁州，泰始五年（269A.D.）才劃入新設置之秦州，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4，〈地理志上〉，頁435。另參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658。

簡介秦州有 32,100 戶，但實際上若將其下所轄六郡之戶數相加總，實為 31,120 戶（隴西郡 3,000 戶、南安郡 4,300 戶、天水郡 8,500 戶、略陽郡 9,320 戶、武都郡 3,000 戶、陰平郡 3,000 戶），²¹⁴誤差達 980 戶，這其中或存在記載上之脫漏。若同樣以一戶 4.4 人記，則秦州之戶數（以 31,120 戶為準）扣除秦州之陰平郡後（陰平東漢時原為廣漢屬國之陰平道，屬益州²¹⁵）共 28,120 戶，其總人口數約為 123,728 人。而雍州轄下有兩郡原屬兩漢時之涼州，即安定郡與北地郡，據《晉志》安定郡有 5,500 戶，而北地郡則有 2,600 戶，²¹⁶同樣以一戶 4.4 人計算，兩郡共有人口約 35,640 人，是以魏晉時期原漢代涼州地域之總戶數 69,920 戶，漢族總人口數約 294,448 人。

可看出此時期河西一帶人數有明顯下降的趨勢，涼州人口僅剩約東漢時期的 62%，這或與漢末董卓之亂的衝擊有關。漢族人口數的下降意味著河西少數民族在當地人口比重中應有所提升，前述關中人口「戎狄居半」的景況可能同時也在河西地區出現。惟因魏晉十六國時期小月氏的人口數史料不明，無法對小月氏在河西的人口比重作進一步的推估。但在三國時期胡侯支富有實力兵援蜀漢，支謙之祖父支法度拜率善中郎將，可想見至少在三國時期河西當地的小月氏人口應為數不少。另在西晉永嘉三年支胡五斗在關中新豐能起兵聚眾數千為亂，五斗在關中所率之部眾應還是來自河西的小月氏人，以此度之魏晉時期小月氏人在西北一帶的族群數量當有一定之規模。

而漢魏隴右河西之地所謂的羌胡，其中所稱胡者究係指哪些胡族？周偉洲認為三國時代西北所謂的羌胡，其中「胡」主要指西域胡人及以匈奴為主的諸雜胡，如盧水胡、費胡、屠各（休屠）、小月氏等。²¹⁷另《三國志·魏書·蘇則傳》中曾提及武威有所謂「三種胡」：「後（麴）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

²¹⁴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4，〈地理志上〉，頁435-436。

²¹⁵ 劉宋·范曄，《後漢書》，志23，〈郡國五〉，頁3514。

²¹⁶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14，〈地理志上〉，頁431。

²¹⁷ 周偉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係研究》，頁32。

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²¹⁸此漢魏之際的三種胡，榎一雄認為即月氏、康居與羌族，²¹⁹陳琳國認為是指匈奴休屠、渾邪二部、小月氏與盧水胡，²²⁰魯西奇則主即貲虜（大胡、丁零與羌）。²²¹陳連慶更主張東漢的羌胡，事實上是西羌和湟中義從胡的簡稱，他舉出《後漢書·西羌傳》曾云「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司馬）鈞分道並北擊零昌」，²²²而同一史事《後漢書·龐參傳》則載「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²²³可見羌胡的胡即湟中義從胡，也就是小月氏族。²²⁴由此可以想見在河西當時所謂的羌胡少數族群中，小月氏應有不少的人口比重。

是以小月氏的總人口數，在西漢時至少有三萬眾以上，東漢時期當有五萬之譜，魏晉時期史料雖無明確數據，但有三至五萬人應是合理的估計。前述陳良佐推測未西遷前的月氏在河西時期人口應在四十萬左右，是以月氏在河西當地一直是個大族，即便後來主力西遷至中亞，但留在河西涼州地區的小月氏人口數量應比學界原先既有的印象還要多。

河西一帶另外幾個重要的少數民族是匈奴、羌族與氐族，但礙於史料所載有限，較難作精細的分析。據葛劍雄的研究，在西漢元始二年，內遷的匈奴人已約有二十萬，但大多居住於長城之外武帝拓地前的匈奴故地。到東漢時，進入漢朝疆域內的匈奴人至少有五十萬。²²⁵《晉書·文帝紀》提及三國時四方歸附曹魏之

²¹⁸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16，〈蘇則傳〉，頁492。

²¹⁹ 榎一雄，〈漢魏時代の敦煌〉，頁18。

²²⁰ 陳琳國，《中古北方民族史探》，頁95。

²²¹ 魯西奇，〈觀念與制度：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雜胡」與「雜戶」〉，《思想戰線》，2018：4（昆明，2018.7），頁36。

²²²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89。

²²³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51，〈龐參傳〉，頁1689。

²²⁴ 陳連慶，〈東漢時期的少數民族士兵〉，收入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452。葉德榮的見解亦同，參見葉德榮，〈漢晉時期西北地區佛教之傳播——以「羌胡」群體奉佛為線索〉，頁217。

²²⁵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 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195-198；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428。

蠻夷戎狄曾高達八百七十餘萬口：

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為寇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²²⁶

惜上列數據缺乏詳細的族群分類統計。前述朱大渭曾估算過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的人口數，大概是因史料失載，未將小月氏列入研究。若參照朱氏的估算，魏晉至北魏內遷和降附的南北匈奴人共約 855,800 人，漢末至北魏氏族的總人數約有 990,000 人，同一時期內遷羌人之降附總數則約為 755,680 人。²²⁷

有關河西一帶的匈奴人口，目前僅有陳良佐曾有過初步統計，他曾估算漢武帝時河西匈奴人口約在十萬左右。²²⁸在羌人方面，有學者認為漢代進入塞內的羌人應不下 70 萬，²²⁹葛劍雄估計西漢時羌人的數量有數十萬，但一部分已納入漢朝戶籍統計，戶口數以外的羌人不會超過二三十萬。²³⁰他計算在東漢時可考的羌人降戶有八萬多戶，約四十萬人，至曹操（155-220）統一北方時，羌人在西北地區已成為人口僅次於漢族的第二大民族。²³¹余英時指出在漢代時羌人的人口超過匈奴，²³²而呂思勉曾粗估過漢時匈奴人口約 150 萬，²³³陳勇則認為東漢時隴右全境的羌人總數大概已

²²⁶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2，〈帝紀第二·文帝〉，頁40。

²²⁷ 朱大渭，〈魏晉十六國北朝北方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總人口數估測〉，頁260-263。

²²⁸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頁18-20。

²²⁹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研究》，頁94。

²³⁰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399。

²³¹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 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頁235-236。

²³² Yü Ying-shih, "Han Foreign Relations," p. 422；中譯本參見余英時，〈漢朝的對外關係〉，頁486。

²³³ 呂思勉，〈匈奴人口〉，收入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660。

與漢族人口數量接近，約 43 萬，²³⁴石方估計東漢之世羌人大約有六十餘萬口內徙，²³⁵袁祖亮則估計西漢時河湟羌人數目不過 20 萬，東漢時青海的羌人則不下 40 萬。²³⁶有關羌人的人口，其實西漢時期《漢書·趙充國傳》已有提及，當時趙充國曾向漢宣帝報告說：「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²³⁷趙充國言羌人有五萬軍隊，以一兵乘以四至五口計，當時羌人數量當有二十餘萬。至於東漢時期的羌人數量，《後漢書·西羌傳》亦有概略的描述，該傳云西羌：

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建武十三年（37），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94），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²³⁸

從和帝永元六年時大牂夷種羌一次可率五十餘萬口內屬，加上在順帝時，羌人勝兵合約可二十萬，那麼估計在東漢時期，其總人口數當接近百萬左右。

²³⁴ 陳勇，〈東漢涼州「羌胡化」述論〉，頁171。

²³⁵ 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頁170。

²³⁶ 袁祖亮，〈中國古代人口史專題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179、204。

²³⁷ 漢·班固，〈漢書〉，卷69，〈趙充國傳〉，頁2992。

²³⁸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87，〈西羌傳〉，頁2898。

至於氐族，黃烈認為三國之前氐人起碼有 50 萬口，²³⁹葛劍雄認為西漢時氐人的數量難以推算，但應該少於羌人，²⁴⁰他稍早認為西北的氐人移民數量有限，東漢晚期西北地區有兩支共兩萬餘落的氐人降漢，人口接近十萬，如死亡逃亡占一半，尚存四、五萬人，²⁴¹但後來他又認為東漢氐人的數量可達數十萬。²⁴²路遇等人的看法亦同，他們認為東漢時西北一帶氐羌人口當在百萬左右。²⁴³至於魏晉時期，葛劍雄批評了王育民認為三國時期少數民族的全部戶口，估計不會少於政府編戶的 1/4 的觀點，然應是礙於資料有限，他並未做出自己的估算。²⁴⁴其實魏晉時期各政權經常大規模強遷轄下的各族部落人口，氐羌、胡族常於華北各地輾轉流徙，人口大量流動的結果，欲做五胡各族精細的人口統計有其實際的困難度。況且魏晉史料中描述胡族人口的「落」是否可以等同於漢人的「戶」也是一個問題，這都導致胡族的實際人口數無法做出進一步精細的統計分析。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河西一帶小月氏的族群數量雖不能與當地的匈奴、氐、羌等大族相提並論，但其人口數在漢晉時期一直約莫仍保有三至五萬之眾，而涼州一地當時的漢族人口除在西漢時期曾突破百萬以外，在東漢及魏晉時期皆在 30-50 萬之間，如此則小月氏在這段時期占漢族人口比率約有百分之 10，顯示東漢以後小月氏人在河西一帶具有相當的實力。從小月氏在東漢末年起即不斷介入當地民變一事，可以看出該族一直是當地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董卓更是倚其力量建立自身在漢末的政治影響力，進而順利操控了當時政局。下迄魏晉十六國時期，雖然五胡入塞者頗眾，人數應遠超過小月氏，然小月氏人仍為石勒等胡族所吸收，直接參與胡人競逐中原的建國事業，可見小月氏人在魏晉時

²³⁹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研究》，頁139。

²⁴⁰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399。

²⁴¹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 第二卷 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頁239。

²⁴²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432。

²⁴³ 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頁157。

²⁴⁴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頁443-447。

期仍有著一定的政治實力，是當時胡族中不能忽視的一股族群勢力。

唐長孺指出從晉以來渭北一帶的支胡部落至北魏時還存在，北地人支西甚至一度起事，²⁴⁵他認為渭北的支胡和羯胡中的支姓必有關係，²⁴⁶前文已提及學界有人即認為羯族實為月氏族，²⁴⁷也有學者認為匈奴在河西的渾邪、休屠二部其實也是月氏。²⁴⁸從兩漢時期開始，小月氏人在河西故地已逐漸開始產生分化，學界有不少意見主張活躍於魏晉時期的盧水胡，就是源自小月氏的一支新的胡族。黃盛璋認為盧水胡在漢初已經存在，元狩二年霍去病所斬殺之盧胡王應即盧水胡。²⁴⁹有關盧水胡的族源問題，學界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此處不贅。²⁵⁰盧水胡能否視為是小月氏？此問題目前尚難解決，本文暫不討論，不過從上述學者的意見來看，未西移的小月氏人口數量顯然比以往學界認為的還要多。

回顧漢晉西北的歷史，小月氏人屢屢以發起動亂成為割據政權領袖，或成為割據政權重要輔佐人物而活躍於此時期的歷史。從東漢末年起事震動京師的北宮伯玉、李文侯，到西晉時期與劉芒蕩合作叛變的支胡五斗，小月氏人之所以有能力發動叛變，正說明了該族群在人數上應有某種的數量優勢，才能有實力敢於起事造反。而三國時期身為涼州諸國王麾下的胡侯支富，之所以能成為諸葛亮爭取聯盟的對象，也反映了小月氏在涼州當地的政治軍事實力。若再加上亦疑為小月氏人的治無戴，從其「涼州胡

²⁴⁵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7，〈魏虜傳〉，頁992。

²⁴⁶ 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21。

²⁴⁷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28-3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頁381-397；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87。

²⁴⁸ 錢伯泉，〈烏孫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遷的經過〉，頁104-107；錢伯泉，〈烏孫的種族及其遷徙〉，頁28-39；陳世良，〈渾邪考〉，頁44-46。

²⁴⁹ 黃盛璋，〈雜胡官印考〉，頁4-5。

²⁵⁰ 參見註釋21。榮新江認為盧水胡為雜胡，但其中有的分支具備更多匈奴的特點而被人們看做匈奴，參見榮新江，〈小月氏考〉，頁50；蕭化亦認為盧水胡是以匈奴為主體，融合羌人與小月氏的雜胡，參見蕭化，〈略談盧水胡的族源〉，頁120。

王」的身分亦可看出小月氏在涼州應有不容小覷的政治力量。在十六國華北紛亂時期，前趙劉曜時其手下即有小月氏人支當曾任都水使者，特別是在石勒後趙政權中，小月氏人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石勒初起時的核心集團十八騎中，即有支屈六、支雄兩名小月氏人，到了石虎時支重曾任其宰相、將軍，因之有些學者認為羯族與小月氏人之間存有密切關係，看來並非虛言。所以無論是在族群比例或實質的政治影響力上，小月氏人在漢晉時期的胡族中都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在當時的歷史中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四、從文獻看小月氏族群的內亞風俗

小月氏作為內亞游牧民族的一支，雖然後來長期與漢族雜處，但從文獻上仍可觀察到他們依然保留了不少內亞的習俗。這些內亞習俗一方面展現了小月氏人的胡族特質，另一方面也讓他們維持族群的獨立性。以下試舉出一些文獻上可觀察到的小月氏內亞風俗：

（一）髻面

髻面是一種流傳極廣的內亞習俗，斯基泰、匈奴、突厥、回鶻、嚙噠、吐蕃、女真、于闐、粟特等西域諸族都有此俗。²⁵¹前文曾提及東漢時鄧訓以恩信獲得小月氏擁戴，願意聽從鄧訓號令，遂有日後之義從胡。在鄧訓死後，從小月氏人哀悼鄧訓的方式，表現出他們仍然維持了一些原有的斯基泰-塞種風俗，²⁵²該傳云：

（永元）四年（92）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

²⁵¹ 江上波夫，〈北方ユウラシア民族の葬禮に於ける髻面、截耳、剪髮について〉，收入江上波夫，《匈奴の社會と文化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311-322；谷憲，〈內陸アジアの傷身行爲に關する一試論〉，《史學雜誌》，93：6（東京，1984.6），頁41-57。此俗或與西亞舊俗有關，參見卓鴻澤，《還音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頁35。

²⁵² 楊希枚，〈論北海、僂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髻面之俗〉，頁7-10。

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²⁵³

此處所提及的以刀自割及刺殺牛馬之俗，與斯基泰人因王卒而殘身及殺馬之俗，可說殆無二致。希羅多德（Herodotus, 484B.C.-430-420B.C.）在描述斯基泰人國王死去的風俗時，曾經寫道：「他們割掉他們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們頭，繞著他們的臂部切一些傷痕，切他們的前額和鼻子並且用箭刺穿他們的左手。……把他們最好的馬五十匹殺死……（4.71,72）」。²⁵⁴

可見即使小月氏已與羌人共居二百餘年，其斯基泰的舊俗依然在部落間流傳不輟。此種風俗亦見於匈奴，《後漢書·南匈奴傳》載曾歷任度遼將軍、征西將軍的耿秉，因善洽胡情，和撫匈奴，所以當他五十多歲去世時，「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²⁵⁵足見當時匈奴同時深受此種斯基泰習俗的影響。馬長壽以為《後漢書》所載羌胡髡面之俗初起於胡人，胡人又傳此俗於羌族，故羌胡俱有引刀割面之俗。²⁵⁶

（二）將敵人梟首懸馬示眾之俗

董卓的這支羌胡兵團一度橫暴京師，在其殘虐劫掠的行動之中，令人側目的是一種與內亞風俗相當類似的作為，《後漢書·董卓列傳》云：「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²⁵⁷這疑似是與斯基泰人同源的小月氏習俗。在古代的內陸歐亞游牧世界，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將敵人梟首後，回師時將頭顱懸掛於馬上展

²⁵³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16，〈鄧訓列傳〉，頁611-612。

²⁵⁴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eorge Rawlinson (New York: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6), pp. 329; 中譯本參見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86。

²⁵⁵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19，〈耿弇傳〉，頁718。

²⁵⁶ 馬長壽，《氐與羌》，頁189。

²⁵⁷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5。

示的習俗。²⁵⁸斯基泰人習慣將敵人首級攜回以誇示自身的勇猛，希羅多德曾言：

斯奇提亞人飲他在戰場上殺死的第一個人的血。他把在戰爭中殺死的所有人的首級帶到他的國王那裡去，因為如果他把首級帶去，他便可以分到一份擄獲物，否則就不能得到。他沿著兩個耳朵在頭上割一個圈，然後揪著頭皮把頭蓋搖出來。隨後他再用牛筋骨把頭肉刮掉並用手把頭皮揉軟，用它當作手巾來保存，把他吊在自己所騎的馬的馬勒上以為誇示；凡是有最多這種頭皮製成的手巾的人，便被認為是最勇武的人物。（4. 64）

至於首級本身，他們並不是完全這樣處理，而只是對他們所最痛恨的敵人才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把首級眉毛以下的各部鋸去並把剩下的部分弄乾淨。如果這個人是一個窮人，那麼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來使用；但如果他是個富人，則外面包上牛皮之後，裏面還要鍍上金，再把它當作杯子來使用。一個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頭來作這樣的杯子，但這必須是與他不合的族人並且是他在國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來訪的時候，他使用這些頭來款待他，並告訴客人，他的這些死去的族人怎樣曾向他挑戰，又被他打敗；他們用這些東西來證明他們的勇武。（4. 65）²⁵⁹

羅馬時期的歷史學家斯特拉博（Strabo, C.64B.C.-C.24）亦記載了當時高盧人類似的習俗，他說：

當他們離開戰場的時候，他們會把敵人的首級掛在自己的

²⁵⁸ Elfriede R. Knauer, "Observations on the 'Barbarian' Custom of Suspending the Heads of Vanquished Enemies from the Neck of Horses," *Archäologisches Mitteilungen aus Iran und Turan* 33 (2001), pp. 283-332.

²⁵⁹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 George Rawlinson, pp. 326-327; 中譯本參見 Herodotus 著，王以鑄譯，《歷史》，頁283-284。

馬頭上，當他們返回自己家裡的時候，他們會把首級釘在自己家門口炫耀。……而且，他們把敵方貴族的首級用松脂防腐之後，用來向外人炫耀（4. 4. 5）。²⁶⁰

希羅多德描述的這種習俗在考古上也有反映，考古學家在黑海北岸塔曼（Taman）半島的希臘人殖民地克波伊（Kepoi）遺址發現了一塊浮雕，上面描繪了斯基泰人將敵人首級懸於馬胸之上的畫面（「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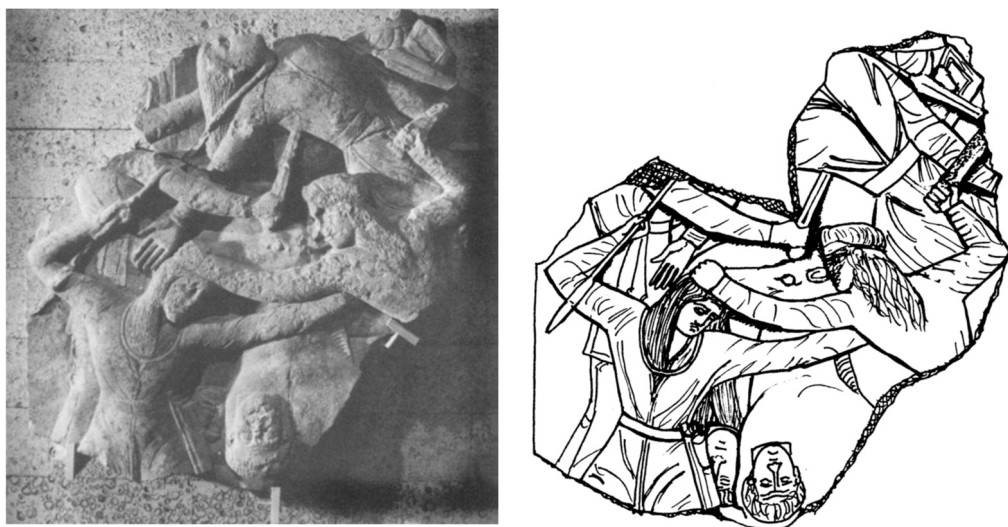


圖 5 黑海北岸克波伊遺址浮雕上斯基泰人將敵人首級懸於馬胸之畫面

資料來源：J. G. F. Hind, "Archaeology of the Greeks and Barbarian Peoples around the Black Sea (1982-1992)," *Archaeological Reports*, 39 (November, 1993), p. 107, fig. 29; U. Mrogenda, et al. "Zu zwei Neufunden spätclassischer Reliefs aus Südrubland," *Boreas* 11 (1988), p. 52.

另一可比擬的考古證據也出現在巴爾幹半島的古代蠻族色雷斯人（Thracians），在西元前 400-350 的色雷斯人方形飾版上，著魚鱗甲的騎馬戰士身後描繪著一顆人頭，似乎是遭其梟首的敵

²⁶⁰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II, trans. H. L.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47, 中譯本參見 Strabo 著，李鐵匠譯，《地理學·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頁 273。

人。（「圖6」）



圖6 色雷斯人方形飾版上騎士後方的敵人首級

資料來源：Alexandre Fol et al., *L'or des Thraces: Trésors de Bulgarie* (Ghent: Snoeck-Ducaju & Zoon, 2002), p.143, fig. 212n.

在雲南與中亞尚有兩個相近的例子可供參照。年代斷限為戰國末期至西漢晚期、東漢初期的雲南晉寧石寨山遺址，²⁶³其中13號墓曾出土一戰爭貯貝器蓋，其中有一疑為將軍之騎馬武士，其坐騎頸下亦見繫有一人頭，為斬獲敵人之首級（「圖7」）。又同墓葬還出土一件攜掠扣飾，上面有兩名著頭盔及魚鱗甲戰袍的武士，兩名武士手中各提著一顆人頭（「圖8」），Elfriede R. Knauer 認為石寨山此二例顯現的主要應是一種草原習俗。²⁶⁴

²⁶³ 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1（北京，1956.3），頁63；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頁110；M. Pirazzoli-t' Serstevens（畢梅雪）認為滇文化的年代在西元前250年至西元50年之間，參見米歇爾·皮拉左里著，吳臻臻譯，〈滇文化的年代問題〉，《考古》，1990：1（北京，1990.1），頁86。

²⁶⁴ Elfriede R. Knauer, "Observations on the 'Barbarian' Custom of Suspending the Heads of Vanquished Enemies from the Neck of Horses," p. 303, note. 59. 有關石寨山與草原文化的關係，參見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87：9（北京，1987.9），頁808-820；張增祺，〈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收入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青銅文化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320-354；霍巍、趙德雲，〈滇



圖 7 雲南石寨山 13 號墓出土戰爭貯貝器蓋上騎士坐騎頸下之首級

資料來源：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頁 56；Jessica Rawson, *The Chinese Bronzes of Yunna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3, p. 54. fig. 36; 57, fig. 40.

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收入霍巍、趙德雲著，〈《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51-80；翟國強，〈北方草原文化南漸研究——以滇文化為中心〉，《思想戰線》，2014：3（昆明，2014.5），頁 18-30；郭物，〈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為中心〉，收入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外文化交流：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 240-267；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種族＝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経路〉，收入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事業會編，〈《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 民族・文化篇》〉（東京：山川出版社，1978），頁 193-214；Emma C. Bunker, C. Bruce Chatwin and Ann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p. 113; TzeHuey Chiou-Peng, “Western Yunnan and Its Steppe Affiniti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I, ed. Victor H. Mair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pp. 280-304; Sophia-Karin Psarras,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Artibus Asiae*, 60: 1 (2000), pp.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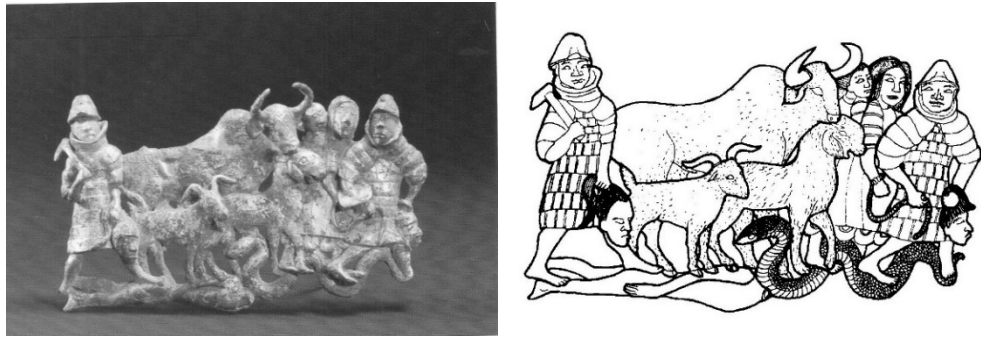


圖 8 雲南石寨山 13 號墓出土擄掠扣飾武士手提之首級

資料來源：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圖版頁 45 彩圖 90，頁 88 圖 63。

而在中亞薩馬爾干（Samarkand）附近奧拉特（Orlat）遺址 2 號墓，曾出土一件骨雕帶扣飾，這件骨雕帶扣飾的年代學界意見分歧，年代的斷限觀點從西元前 2 世紀到西元後 5 世紀都有，J. Y. Ilyasov 認為是在西元後 1-3 世紀之間。²⁶⁵ 值得留意的上面刻畫了一個戰爭的場景，其中畫面上有一持長劍之重裝騎士，其坐騎胸前即懸掛了一顆敵人之頭顱（「圖 9」），此畫面展現的應是一種塞種（Saka）或月氏的風俗。²⁶⁷

²⁶⁵ 參見 Jangar Ya Ilyasov. and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98), pp. 123-130; B. A. Litvinsky, "The Bactrian Ivory Plate with a Hunting Scene from the Temple of the Oxu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pp. 145-148.

²⁶⁷ Elfriede R. Knauer, "Observations on the 'Barbarian' Custom of Suspending the Heads of Vanquished Enemies from the Neck of Horses," p. 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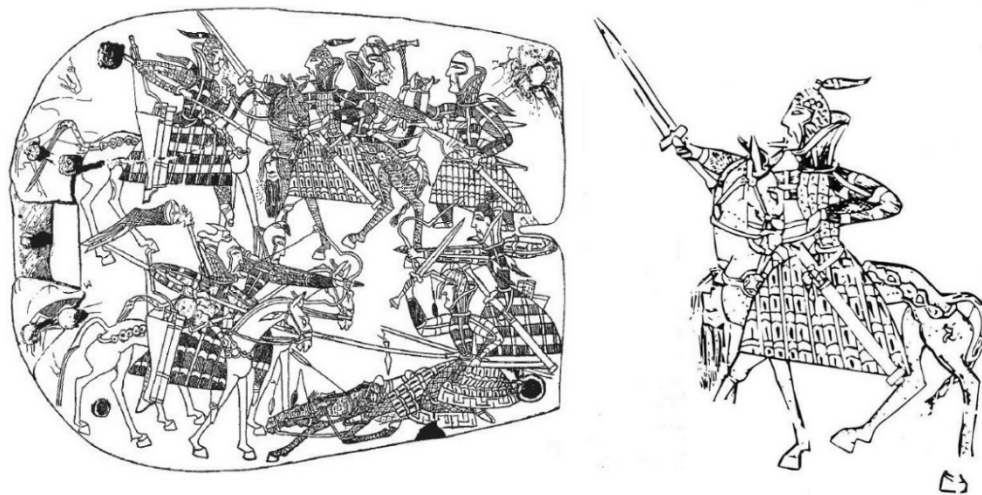


圖 9 薩馬爾干奧拉特骨雕貴霜重裝騎士坐騎胸前懸掛之敵人頭顱

資料來源：Jangar Ya Ilyasov. and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1998), p. 146, plate. 4; Markus Mode, “Some Notes on the Sword of Kanishka,”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13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Vol. 2, eds. Raymond Allchin and Bridget Allchin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Publishing Co., 1997), p. 547, fig. 4.

其實在殷周之際也有一個類似例子或許可一併參考，武王（1076B.C.-1043B.C.，1046B.C.-1043B.C.在位）伐紂時紂王（?-C.1046B.C.，1075B.C.-1046B.C.在位）與兩個寵妃皆自盡，武王割下他們的人頭後，曾懸於軍旗之上，《史記·周本紀》載：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²⁶⁸

周武王此種將敵人梟首後高懸示眾，加上其使用輕劍（短劍）之做法，疑似與內亞習俗有關。周人曾經是戎狄世界的一員，自古公亶父後才開始「貶戎狄之俗」，²⁶⁹有關周人的戎狄性問題學界

²⁶⁸ 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頁124-125。

²⁶⁹ 漢·司馬遷，《史記》，卷4，〈周本紀〉，頁114。

早有發覆，²⁷⁰從〈周本紀〉的記載看來，中國北方早在西元前第二千紀末便疑有此俗，此俗的流行時間似乎甚早。所以從上述的例子來看，《後漢書·董卓列傳》所提到羌胡兵團令漢人驚駭的「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習俗，應與早期內亞游牧族群的此種將敵人梟首後以馬攜回誇示之胡俗密切相關。

（三）驍勇善戰

月氏胡的疆勇善戰，亦曾令三國時人印象深刻。曹植（192-232）的詩作〈白馬篇〉有過這樣的形容：「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²⁷¹曹植在詩中以射殺月支來凸顯幽并游俠之善戰，但以月氏作為馳射的隱喻對象，同時也表明了月氏人似乎是當時胡族剽悍形象的表徵。前述提及董卓手下之羌胡兵團多以小月氏人為骨幹，該支兵團以善戰聞名，可以顯見小月氏人的堅實戰力已受到時人矚目，此種強悍驍勇的胡族特徵，似乎在小月氏人身上展現無遺。小月氏人相較於當時其他族群人數雖然較少，但卻屢屢能以少勝多而令周邊族群忌憚，前述《後漢書·鄧訓列傳》即曾特別提到小月氏胡「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²⁷²其剽悍之族性，甚至到了五代時期作為其後裔的仲雲族依然如此（詳後），這或許就是董卓會如此倚賴他們的原因。

（四）嗜利

小月氏另有一內亞習俗亦值得留意，即游牧民族常被定居農

²⁷⁰ 杜正勝，〈從爵制論商鞅變法所形成的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臺北，1985.9），頁522-529；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87：5（臺北，1993.11），頁1-25；佐藤長，〈秦王朝の系統について〉，《鷹陵史學》，14（京都，1988.10），頁26；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頁148-152；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pp. 418-423; E. G. Pulleyblank, "Ji 姬 and Jiang 姜: The Role of Exogamic Cla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Zhou Polity," *Early China* 25 (2000), pp. 1-27.

²⁷¹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432。

²⁷²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16，〈鄧訓列傳〉，頁609。

業民族所詬病之嗜利。所謂「夷狄貪婪」是中國史家最鍾愛的慣用語，也是野蠻人屬性描寫中最重要之母題。²⁷³《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裴松之注引《獻帝紀》曰：

（李）傽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傽由此衰弱。²⁷⁴

李傽（?-198）所召之羌胡即原先董卓以小月氏為骨幹之兵團，他先對羌胡賄之以皇室繒綵，繼而又許諾將賞與宮人婦女作為戰利品，未料賈詡（147-223）洞悉羌胡素貪，反以更多爵位重寶誘之，果令羌胡隨即決定撤兵。

漢人對游牧民族之嗜利記載，亦見於《史記·匈奴列傳》：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²⁷⁵

班固在《漢書》也曾說過「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²⁷⁶東漢時臧宮（?-58）亦曾云：

²⁷³ Denis Sinor, "The Greed of the Northern Barbarian," in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Hampshire and Brookfield: Ashgate Publishing Co., 1997), p. 171, 179; 中譯另參丹尼斯·塞諾 (Denis Sinor) 著、胡鴻譯，〈北方野蠻人之貪婪〉，收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1、131。

²⁷⁴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卷10，〈賈詡傳〉，頁328。

²⁷⁵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905。

²⁷⁶ 漢·班固，《漢書》，卷94下，〈匈奴傳下〉，頁3834。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²⁷⁷

《鹽鐵論》中也曾出現類似言論：「春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躄而扶猛虎也」。²⁷⁸當然上述這些對游牧民族天性嗜利的譴責，都是基於華夏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歧見，²⁷⁹忽略了游牧社會的經濟特性，以致倒果為因，²⁸⁰而「貪而好利」一語，正足以說明他們對農業民族在經濟上的依存。²⁸¹

最後《後漢書·董卓列傳》的一處記載或可作為漢族認為小月氏胡嗜利之旁證。前文曾提及董卓拒絕奉召京時曾云：「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²⁸²此處董卓用「羌胡敝腸狗態」一語來形容湟中月氏胡與秦胡，對於此句李賢注曰：「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怛，急性也。』」²⁸³此中郭璞（276-324）將急性與狗做連結，正可側面反映其嗜利之性。

因此從小月氏人在史料上所呈現的種種行為來看，若自漢武帝將河西納入版圖算起直至東漢末年，他們進入漢地與漢人錯居

²⁷⁷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18，〈臧宮列傳〉，頁695。

²⁷⁸ 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8，〈世務第四十七〉，頁508。

²⁷⁹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頁219。

²⁸⁰ 蕭啟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食貨月刊》，1：12（臺北，1972.3），頁2。

²⁸¹ 札奇斯欽，〈游牧民族軍事行動的動機〉，《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5（臺北，1974.7），頁25。

²⁸²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2。

²⁸³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72，〈董卓列傳〉，頁2322。

已逾三百年，但仍保有不少內亞游牧民族的固有習俗，足見其胡族屬性仍十分明顯，這是小月氏人我族意識濃厚的一個展現。而此種強烈我族意識，也讓小月氏人遲遲未完全融入其他周邊族群而保持獨立，下迄唐代仍然可見該族之活動，《舊唐書·吐蕃傳》：

（大曆）九年（774）四月，以吐蕃侵擾，預為邊備，乃降敕：「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眾，嚴會柁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眾，橫絕高壁，斜界連營……」。²⁸⁴

此處所言之河湟義從，實為小月氏。²⁸⁵可見青海河湟一帶的小月氏人下迄唐代仍在當地活動，甚至到了五代時期仍可見該族後裔蹤跡，《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引高居誨《使于闐記》云：「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氏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州人皆憚之」，²⁸⁶可知仲雲實小月氏之遺裔，其強悍的族性依然為五代時人所矚目，故該族能一直維持其族群直至五代才逐漸消失，應與其始終能維持該族的某些固有胡性有關。

五、結論

被匈奴擊敗後的月氏人雖大部分西遷中亞，但是選擇留在河西故地的族群數量可能比原先預期的還要更多。從漢晉歷史中小月氏人屢屢出現於史籍中可知，小月氏雖被冠上「小」字，但其人口數量應常保有近五萬人左右，此族群數量雖遠比不過匈奴、氐、羌，但卻是河西地區胡族中相當重要的一股勢力。在追蹤月

²⁸⁴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96 下，〈吐蕃傳下〉，頁 5244。

²⁸⁵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頁 147。

²⁸⁶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74，〈四夷附錄第三·于闐〉，頁 918。

氏後裔支姓胡族的歷史活動後可以發現，小月氏人在漢末魏晉之際的歷史中其實相當活躍。在河西的胡族之中，小月氏可能是當地所謂「三種胡」之一，其族群數量應在當地胡族之中占有一定之比重，特別是在漢末至魏晉史料的羌胡之中，小月氏胡可能是所謂「羌胡」中胡族的重要組成分子。小月氏人應源自於廣義的斯基泰—塞種部落，與匈奴同俗，皆屬於內亞地區的草原騎馬游牧文化。因此在他們身上仍然可觀察到不少內亞的文化因素，譬如髡面、刻意展示敵人之梟首、驍勇善戰與北族常為華夏漢族所詬病之貪婪。從小月氏人身上的內亞胡族色彩，正可反映漢晉之際胡族馳騁中原後所帶來的文化衝擊，邊關將領仰賴這些剽悍的胡族來積蓄個人的政治實力，於漢末天下大亂之際企圖窺伺神器，自此羌胡之族勢力漸長，最終引發中國歷史上第一波大規模的胡化浪潮。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韋彥廷）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3。
- 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晉·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4。
-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劉宋·范曄，《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南朝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南朝梁·釋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北齊·魏收，《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房玄齡等，《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甘肅省文物考古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上》，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林梅村編，《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 陳介祺編，《十鐘山房印舉》，北京：中國書店，1985。
-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8。
- Herodotus著，王以鑄譯，《歷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 Strabo著，李鐵匠譯，《地理學·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II*.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Cambridge, MA: Harrard Univerdiyy Press, 1969.

二、近人專書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石方，《中國人口遷移史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

任乃強，《羌族源流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

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李并成、斯豪強，《敦煌通史·兩漢卷》，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

李智文，《石勒評傳》，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李曉傑，《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汪受寬，《甘肅通史·秦漢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8。

辛德勇，《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卓鴻澤，《還音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周振鶴，《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周振鶴、李曉傑、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周偉洲，《中國中世民族關係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

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上

-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
- 桑原鷺藏著，楊鍊譯，《張騫西征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
- 袁祖亮，《中國古代人口史專題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
- 馬長壽，《氐與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馬非白，《秦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
- 高榮，《先秦漢魏河西史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 高榮、賈小軍、濮仲遠，《漢化與胡化：漢唐時期河西的民族融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 張增祺，《晉寧石寨山》，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
- 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著、鄒秋筠譯，《洛陽大火：公元23-220的後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陳琳國，《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黃烈，《中國古代民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 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 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 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 趙尺子，《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臺北：中國邊疆語文學會，1969。
- 齊陳駿主編，《西北通史·第二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 戴鈞良等主編，《中國古今地名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 謝偉傑著，劉子鈞譯，《東漢的崩潰：西北邊陲與帝國之邊緣》，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
- 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
-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 秦·西漢·東漢時期》，北京：地圖出版社，1985。
- 蘇慶彬，《兩漢迄五代入居中國之蕃人氏族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 小野響，《後趙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20。
- 初山明，《漢帝国と辺境社会：長城の風景（増補新版）》，市川：志學社，2021。
-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東京：講談社，2007。
- 関尾史郎，《三国志拾遺 続——文献と文物の間》，横須賀：NakazatoLabo，2022。
- 関尾史郎，《三国志拾遺 補——東アジア・石刻ほか》，横須賀：Nakazato Labo，2023。
- 関尾史郎，《周縁の三国志——非漢族にとっての三国時代》，東京：東方書店，2023。
- Benjamin, Craig G. R. *The Yuezhi: Origin, 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 Turnhout: Brepols, 2007.
- Bunker, Emma C. C., Bruce Chatwin and Ann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1970.
- Crespigny, Rafe de. *Fire Over 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220 AD*. Leiden: Brill, 2017.
- Fol, Alexandre. et al. *L'or des Thraces: Trésors de Bulgarie*. Ghent: Snoeck-

- Ducaju & Zoon, 2002.
- Laufer, Berthold. *The Language of the Yüe-chi or Indo-Scythians*. Chicago: R. R. Donnelley & Sons Company, 1917.
- Rawson, Jessica. *The Chinese Bronzes of Yunnan*.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3.
- Tse, Wicky W. K. *The Collapse of China's Later Han Dynasty, 25-220 CE: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s and the Edge of Emp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Vaissière, Étienne de la.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 Brill, 2005.

三、近人論文

- 丹尼斯·塞諾 (Denis Sinor) 著、胡鴻譯，〈北方野蠻人之貪婪〉，收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譯，《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0-131。
- 支靜，〈小月氏歷史考述〉，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民族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 方詩銘，〈董卓對東漢政權的控制及其失敗〉，《史林》，1992：2，上海，1992.7，頁9-16。
- 王希恩，〈漢末涼州軍閥集團簡論〉，《甘肅社會科學》，1991：2，蘭州，1991.5，頁71-75、67。
- 王宗維，〈秦漢之際河西地區的民族及其分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3，蘭州，1985.10，頁88-97。
- 王宗維，〈盧水胡與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2，蘭州，1995.12，頁85-108。
- 王宗維，〈匈奴諸王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2，呼和浩特，1985.5，頁1-22。
- 王宗維，〈漢代河西與西域之間的相互關係〉，《新疆社會科學》，1985：3，烏魯木齊，1985.6，頁67-79。
- 王宗維，〈漢代祁連山路考述〉，《西北師大學報》，1983：3，蘭州，1983.5，頁43-48。

- 王宗維，〈漢代盧水胡的族名與居地問題〉，《西北史地》，1985：1，蘭州，1985.3，頁25-34。
- 王青，〈也論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西北史地》，1997：2，蘭州，1997.6，頁25-30。
- 王建新，〈中國西北草原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的新進展——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收入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頁237-253。
- 王建新、席琳，〈東天山地區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1，北京，2009.1，頁28-37。
- 王國維，〈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收入王國維，《觀堂集林 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83，頁1156-1158。
- 平正，〈漢魏以前固原境內的民族及其遷徙〉，《固原師專學報》，1993：2，固原，1993.7，頁77-80。
- 札奇斯欽，〈游牧民族軍事行動的動機〉，《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5，臺北，1974.7，頁21-46。
- 朱大渭，〈儒家民族觀與十六國北朝民族融合及其歷史影響〉，《中國史研究》，2004：2，北京，2004.5，頁37-64。
- 朱大渭，〈魏晉十六國北朝北方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總人口數估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4，北京，2007.8，頁259-271。
- 朱子彥、呂磊，〈論漢魏之際羌胡化的涼州軍事集團〉，《軍事歷史研究》，2007：3，北京，2007.9，頁107-117。
- 米歇爾·皮拉左里（M. Pirazzoli-t'Serstevens）著，吳臻臻譯，〈滇文化的年代問題〉，《考古》，1990：1，北京，1990.1，頁78-86。
- 霍古達（Gustar Maloun）著，艾立德（Alexander Kais）譯，〈關於月氏問題〉，《歷史教育》，22，臺北，2019.12，頁153-225。
- 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綜考〉，收入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編，《中亞學刊（3）》，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7-46。
- 余太山，〈寄多羅貴霜的若干問題〉，《歐亞學刊》，新2輯，北京，2015.10，頁14-34。
- 余英時，〈漢朝的對外關係〉，收入杜希德、魯惟一編，韓復智主譯，

- 《劍橋中國史·秦漢篇》，臺北：南天書局，1996，頁497。
- 吳方基，〈遼中月氏胡與「首施兩端」辨析〉，《秦漢研究》，6，咸陽，2012.8，頁229-239。
- 吳成明、吳方基，〈東漢遼中月氏胡居住地考〉，《邢臺學院學報》，33：3，邢臺，2018.9，頁131-132。
- 吳初驤、余堯，〈居延新獲建武秦胡冊再析〉，《西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4，蘭州，1984.6，頁20-26。
- 呂思勉，〈匈奴人口〉，收入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657-661。
- 李并成，〈漢張掖屬國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2，蘭州，1995.12，頁60-64、77。
- 李志敏，〈支胡考——兼談秦胡在史冊消失問題〉，《西北民族研究》，1995：1，蘭州，1995.6，頁111-116、75。
- 李健超，〈漢唐時期長安、洛陽的西域人〉，《西北歷史研究》，1988年號（蘭州，1990.3），頁41-83。
- 杜正勝，〈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大陸雜誌》，87：5，1993.11，頁1-25。
- 杜正勝，〈從爵制論商鞅變法所形成的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臺北，1985.9，頁485-544。
- 沈騫，〈河西小月氏、盧水胡與河東羯胡關係探源〉，《敦煌學輯刊》，2015：4，蘭州，2015.12，頁132-142。
- 肖化，〈略談盧水胡的族源〉，《西北師院學報》，1983：2，蘭州，1983.3，頁118-120、81。
- 初世賓，〈懸泉漢簡羌人資料補述〉，《出土文獻研究》，6，上海，2004.12，頁167-189。
- 初昉師賓，〈再釋「秦胡」〉，收入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二屆簡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7-27。
- 初師賓，〈關於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組漢簡〉，《敦煌研究》，1985：3，蘭州，1985.10，頁59-62。
-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

- 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17-176。
- 周榮，〈甘肅崇信出土「貨泉」銅母範〉，《文物》，1989：5，北京，1989.5，頁55。
- 尚永琪，〈漢晉時期的月氏僧人〉，收入尚永琪，《胡僧東來——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家與傳播人》，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16-26。
- 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兼論西域三十六國之形成〉，《西域研究》，2013：2，烏魯木齊，2013.4，頁90-104。
- 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1997：1，烏魯木齊，1997.3，頁11-20。
- 林梅村，〈洛陽所出法盧文井欄題記——兼論東漢洛陽的僧團與佛寺〉，收入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387-404。
- 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收入氏著，《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33-67。
- 武沐，〈渾邪休屠族源探蹟〉，《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1，蘭州，2004.1，頁10-15。
- 侯丕勛，〈「祁連小月氏」族源新探〉，《青海民族研究》，2001：4，西寧，2001.12，頁28-32。
-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收入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80-192。
-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西晉支伯姬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3，北京，2009.3，頁36-40。
-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頁127-192。
- 秦鐵柱，〈西漢時期匈奴歸義列侯論析〉，《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9：10，商丘，2013.10，頁55-60。
- 翁育瑄，〈唐代後期支竦家族研究〉，《漢學研究》，40：4，臺北，2022.12，頁73-120。

- 馬小鶴，〈隋唐時代洛陽華化月支胡初探〉，收入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323-337。
- 馬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2，烏魯木齊，1984.5，頁18-28。
- 高榮，〈漢代河西人口蠡測〉，《甘肅高師學報》，5：1，蘭州，2000.2，頁62-65。
- 高榮，〈漢代張掖屬國新考〉，《敦煌研究》，2014：4，蘭州，2014.8，頁95-100。
- 商春芳，〈洛陽博物館藏「晉歸義胡王」金印與絲綢之路上的民族往來〉，收入商春芳，《洛陽考古與絲綢之路人文交流》，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頁65-75。
- 張大可，〈試論董卓及其涼州兵團〉，《西北史地》，1985：4，蘭州，1985.12，頁21-28。
- 張多勇，〈從居延 E. P. T59·582漢簡看漢代涇陽縣、烏氏縣、月氏道城址〉，《敦煌研究》，2008：2，蘭州，2008.4，頁65-70。
- 張葳，〈唐支訥家族遷葬洛陽事考——一個小月氏胡人家族的官僚化歷程〉，《民族研究》，2012：5，北京，2012.9，頁63-73。
- 張增祺，〈再論雲南青銅時代「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及其傳播者〉，收入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青銅文化論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320-354。
- 張增祺，〈雲南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及北方草原文化遺物〉，《考古》，1987：9，北京，1987.9，頁808-820。
- 張德芳，〈西北漢簡中的絲綢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5，鄭州，2014.10，頁26-35。
- 許新國，〈大通上孫家寨出土「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考說〉，《青海社會科學》，1989：4，西寧，1989.8，頁70-73。
- 郭物，〈邊地文化傳播帶：以石寨山文化的考古發現為中心〉，收入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外文化交流：劉慶柱先生七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240-267。

- 陳世良，〈渾邪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烏魯木齊，1989.5，頁38-47。
-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大陸雜誌》，37：3，臺北，1968.8，頁8-32。
- 陳金生、張郁萍，〈兩漢張掖屬國述論〉，《敦煌研究》，2014：5，蘭州，2014.10，頁102-107。
- 陳勇，〈東漢涼州「羌胡化」述論〉，收入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編，《何茲全先生八十五華誕紀念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63-176。
- 陳勇，〈董卓進京述論〉，《中國史研究》，1995：4，北京，1995.11，頁109-121。
- 陳健文，〈月氏的名稱、族屬以及漢代西陲的黑色人問題〉，收入國際簡牘學會編，《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一號）》，臺北：蘭臺出版社，1993，頁111-143。
- 陳健文，〈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學術集林·卷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331-358。
- 陳國燦，〈魏晉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與火祿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1，蘭州，1988.7，頁198-209、282。
- 陳連慶，〈東漢時期的少數民族士兵〉，收入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443-457。
- 陳曉露，〈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人〉，《邊疆考古研究》，19，長春，2016.6，頁207-221。
- 勞榦，〈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收入勞榦，《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1-36。
- 雲南省博物館考古發掘工作組，〈雲南晉寧石寨山古遺址及墓葬〉，《考古學報》，1956：1，北京，1956.3，頁43-63。
- 馮培紅，〈絲綢之路隴右段粟特人蹤跡鉤沉〉，《浙江大學學報》，2016：5，杭州，2016.9，頁54-70。
- 馮霞，〈論月氏入華的幾個重要問題〉，蘭州：蘭州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 黃烈，〈北涼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古代史論叢》，1982：1，福州，1982.12，頁231-235。
- 黃盛璋，〈敦煌文書中的「南山」與仲雲〉，《西北民族研究》，1989：1，蘭州，1989.7，頁4-12。
- 黃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4，蘭州，1986.12，頁1-10。
- 楊希枚，〈論北海、僂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髡面之俗〉，《大陸雜誌》，38：1，臺北，1969.1，頁7-10。
- 楊芳，〈漢代河西人口分布系統考述〉，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 楊富學、袁煒，〈在華月氏人「以國為氏」考〉，《青海師範大學學報》，45：2，西寧，2023.3，頁18-24。
- 楊富學、劉源，〈出土簡牘所見漢代敦煌民族及其活動〉，《敦煌研究》，2019：3，蘭州，2019.6，頁32-44。
- 楊濤、黃永會、孟志平、陶榮，〈「月氏」銘貨泉銅母範〉，《中國錢幣》，2016：4，北京，2016.8，頁40-41、彩頁9。
- 萬國鼎，〈漢以前人口及土地利用之一斑〉，《金陵學報》，1：1，南京，1931.5，頁133-150。
- 萬翔，〈寄多羅人年代與族屬考〉，《歐亞學刊》，9，北京，2009.12，頁115-160。
- 葉德榮，〈漢晉時期西北地區佛教之傳播——以「羌胡」群體奉佛為線索〉，收入葉德榮，《漢晉胡漢佛教論稿》，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216-240。
- 雷家驥，〈氐羌種姓文化及其與秦漢魏晉的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6：1，嘉義，1995.12，頁159-209。
- 雷家驥，〈後趙文化適應及其兩制統治〉，《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5：1，嘉義，1994.10），頁173-235。
- 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3，北京，1990.11，頁47-62。
- 管東貴，〈漢代的羌族（下）〉，《食貨月刊（復刊）》，1：2，臺北，1971.5，頁13-23。

- 翟國強，〈北方草原文化南漸研究——以滇文化為中心〉，《思想戰線》，2014：3，昆明，2014.5，頁18-30。
- 趙尺子，〈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中國邊政》，5，臺北，1964.7，頁10-13。
- 趙永復，〈關於盧水胡的族源及遷移〉，《西北史地》，1986：4，蘭州，1986.12，頁50-53。
- 趙振績，〈月氏族系與亞洲氏地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年報》，16，臺北，1985.10，頁159-169。
- 劉玉璟，〈漢代人遷河西地區移民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2。
- 劉光華，〈建郡後的漢代河西〉，《敦煌學輯刊》，1981：2，蘭州，1981.12，頁87-99。
- 劉淑芬，〈從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滅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1，臺北，2001.3，頁1-48。
- 魯西奇，〈觀念與制度：魏晉十六國時期的「雜胡」與「雜戶」〉，《思想戰線》，2018：4，昆明，2018.7，頁35-49。
- 黎明釗，〈懸泉置漢簡的羌人問題——以《歸義名籍》為中心〉，《九州學林》，34，香港，2014.6，頁19-44。
- 蕭啟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食貨月刊》，1：12，臺北，1972.3，頁1-11。
- 錢伯泉，〈仲雲族始末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89：1，蘭州，1989.7，頁64-71。
- 錢伯泉，〈烏孫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遷的經過〉，《敦煌研究》，1994：4，蘭州，1994.12，頁104-112。
- 錢伯泉，〈烏孫的種族及其遷徙〉，《西域研究》，1997：4，烏魯木齊，1997.12，頁28-39。
- 閻廷亮，〈小月氏考〉，《甘肅高師學報》，3：2，蘭州，1998.6，頁92-95、109。
- 霍巍、趙德雲，〈滇文化動物意匠與歐亞草原關係的再檢視〉，收入霍巍、趙德雲，《戰國秦漢時期中國西南的對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51-80。

- 薛海波，〈試論敦煌懸泉漢簡中的羌〉，《通化師範學院學報》，25：3，通化，2004.3，頁41-44。
- 韓康信、潘其風，〈關於烏孫、月氏的種屬〉，收入西域史論叢編輯組編，《西域史論叢·第三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頁8-12。
- 魏樂樂，〈兩漢迄唐徙居內地月氏人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 蘇北海，〈大月氏的西遷及其活動〉，《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烏魯木齊，1989.5，頁31-37。
- 顧頡剛，〈兩漢州制考〉，收入顧頡剛，《顧頡剛全集5·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67-230。
- 小野響，〈石勒十八騎考——後趙政權の基礎的理解に向けて——〉，《立命館文學》，657，京都，2018.3，頁11-31。
- 白鳥芳郎，〈石寨山文化に見られるスキタイ系文化の影響——種族=民族の交流とその経路〉，收入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事業會編，《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記念論集 民族·文化篇》，東京：山川出版社，1978，頁193-214。
- 江上波夫，〈北方ユウラシア民族の葬礼に於ける髻面、截耳、剪髮について〉，收入江上波夫，《匈奴の社會と文化 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 3》，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頁311-322。
- 佐藤長，〈秦王朝の系統について〉，《鷹陵史學》，14，京都，1988.10，頁1-28。
- 佐藤達郎，〈漢代における周辺民族と軍事——とくに属国都尉と異民族統御官を中心に〉，收入宮宅潔編，《多民族社会の軍事統治：出土史料が語る中国古代》，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8，頁215-242。
- 谷憲，〈内陸アジアの傷身行爲に關する一試論〉，《史学雜誌》，93：6，東京，1984.6，頁41-57。
- 桑原鷺藏，〈張騫の遠征〉，收入宮崎市定論，《桑原鷺藏全集第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261-335。
- 桑原鷺藏，〈隋唐時代に支那に來住した西域人に就いて〉，收入宮崎市

- 定論，《桑原鷺藏全集・第二卷・東洋文明史論叢》，東京：岩波書店，1968，頁270-360。
- 榎一雄，〈小月氏と尉遲氏〉，收入末松保和博士古稀記念會編，《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頁389-418。
- 榎一雄，〈漢魏時代の敦煌〉，收入榎一雄，《講座敦煌 2・敦煌の歴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頁3-37。
- 滿田剛，〈蜀漢・諸葛亮の北伐戦略と隴西・河西回廊の非漢族について——後漢・三国期の羌・「涼州諸國王」〉，《東洋哲学研究所紀要》，33，東京，2017.12，頁151-171。
- 関尾史郎，〈「涼州諸國王」と蜀地方〉，《東洋学術研究》，59：2，東京，2020.12，頁76-84。
- 潮田富貴藏，〈湟中月氏胡について〉，《研究集録（人文・社科）》，8，大阪，1960.1，頁63-69。
- Aydemir, Haka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me Yuezhi 月氏 / 月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 Uyghur Studies*, 1: 2 (December, 2019), pp. 249-282.
- Brough, John. “Comments on Third-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8: 3 (1965), pp. 582-612.
- Enoki, K., G. A. Koshelenko, and Z. Haidary.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700 B.C. to A.D. 250*, edited by János Harmatta, pp. 171-190.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 Enoki, Kazuo. “The Yüeh-chih-Scythians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pp. 22-29. Tokyo: Kyuko Shoin, 1998.
- Haloun, Gustav. “The Liang-Chou Rebellion.” *Asia Major*, n.s. 1: 1 (1949), pp. 119-132.
- Haloun, Gustav.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2 (1937), pp. 243-318.

- Hind, J. G. F. "Archaeology of the Greeks and Barbarian Peoples around the Black Sea (1982-1992)." *Archaeological Reports*, 39 (November, 1993), pp. 82-112.
- Ilyasov, Jangar Ya. and Dmitriy V. Rusanov. "A Study on the Bone Plates from Orl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1997-1998), pp. 107-159.
- Knauer, Elfriede R. "Observations on the 'Barbarian' Custom of Suspending the Heads of Vanquished Enemies from the Neck of Horses." *Archäologisches Mitteilungsblatt aus Iran und Turan*, 33 (2001), pp. 283-332.
- Litvinsky, B.A. "The Bactrian Ivory Plate with a Hunting Scene from the Temple of the Oxu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2001), pp. 137-166.
- Mode, Markus. "Some Notes on the Sword of Kanishka."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Vol. 2, edited by Raymond Allchin and Bridget Allchin, pp. 543-556. New Delhi: Oxford and IBH Publishing Co., 1997.
- Mrogenda, U., H.-H. Nieswandt, W. Oenbrink, A. Schütte, K. Stähler, and R. Stupperich. "Zu zwei Neufunden spätklassischer Reliefs aus Südrußland." *Boreas*, 11 (1988), pp. 51-61.
- Psarras, Sophia-Karin. "Rethinking the Non-Chinese Southwest." *Artibus Asiae*, 60: 1 (2000), pp. 5-58.
- Pulleyblank, E. G.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8: 1 (January, 1966), pp. 9-39.
- Pulleyblank, E. G.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by David N. Keightley, pp. 418-4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Pulleyblank, E. G. "Ji 姬 and Jiang 姜: The Role of Exogamic Cla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Zhou Polity." *Early China*, 25 (2000), pp. 1-27.
- Sinor, Denis. "The Greed of the Northern Barbarian." In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edited by Denis Sinor, pp. 171-182. Hampshire and Brookfield: Ashgate Publishing Co., 1997.

TzeHuey, Chiou-Peng. "Western Yunnan and Its Steppe Affiniti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I*,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pp. 280-304.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1998.

Yü, Ying-shih. "H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pp. 377-4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Lesser Yuezhi among the Qiang-Hu Peoples in the Hexi Region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Chen, Chien-wen*

Abstract

After being defeated by the Xiongnu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period, the Yuezhi were forced to migrate westward to Central Asia. From that point onward, those who migrated were known as the Greater Yuezhi, while those who remained in the Hexi Corridor were called the Lesser Yuezhi.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 regarding the Lesser Yuezhi are scattered and fragmented, resulting in an unclear picture of their presence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Historians have noted that during these periods, the Yuezhi people often adopted the surname Zhi. This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recorded activities of the Lesser Yuezhi from Han and Jin historical texts and then estimates their population during the Han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ir demographic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e ethnic status of the Lesser Yuezhi in the Hexi region during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Fi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ner Asian customs associated with the Lesser Yuezhi, as documented in historical sourc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Lesser Yuezhi retained a population of at least 30,000 to 50,000 in the Hexi and Liangzhou regions during the Han period, constituting about one-tenth of the local Han population and representing a significant ethnic group in the area. Furthermore, in the so-called Qiang and Hu forces of the Hexi region during the late Eastern Han period, the Lesser Yuezhi were likely a key component of the Hu groups. Dong Zhuo leveraged this force to gain power and control at the end of the Han period. Despite coexisting with the local Han people for over 200 years, the Lesser Yuezhi preserved certain customs of the Inner Asian nomadic Hu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eoples, which may have been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us, tracing the activities of the Lesser Yuezhi during this period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later enabled the Five Hu to contend for dominance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Keywords: Lesser Yuezhi, Auxiliary of Loyal Barbarians, Hexi Region, Qiang-Hu, Inner Eurasian Customs

